

2021年第1期 总第12期

“一带一路”学术参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主办



目 录

2021 年第 1 期（总第 12 期）

资讯焦点

我国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5 份	1
外交部：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是假，挑拨离间中非关系是真	2
2021年1月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4
绿色是“一带一路”最动人的色彩	4
全国政协委员周勇：三句话阐释“一带一路”巨大效益	5

深度透视

乘风破浪 “克”疫而上——“一带一路”建设走向可持续发展	5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答记者问 “一带一路”成焦点	9
两会聚焦：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10

交流与成果

学者成果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合作问题研究	12
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比较	16
“一带一路”视阈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探究	21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27

学术前沿

智库报告

“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中医药中心建设现况与启示	37
-------------------------	----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发展-----	37
机制供给与“一带一路”发展合作-----	38
制度距离与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	39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40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研究-----	41
中国-拉美共建“一带一路”的现状、问题与启示-----	42
政治法律	
“一带一路”背景下金融法律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探究-----	43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重构-----	44
“一带一路”倡议下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区域化改革前瞻-----	44
“一带一路”背景下铁路提单的法律支撑-----	45
经贸金融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广西与东盟国家林业合作探究-----	46
“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省对外贸易潜力研究-----	47
英语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48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48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投资：研究述评与展望-----	49
“一带一路”对云南与东盟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分析-----	50
“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数字贸易水平的测度及其对中国外贸成本的影响-----	51

资讯焦点

1、我国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5 份

【来源】商务部网站(2021-01-30)

【编辑】张广琳

【正文】商务部综合司司长储士家在 29 日召开的商务部专题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国与 17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20 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同有关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一批重大项目进展平稳，尤其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成效明显，“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这充分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一年来，商务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努力应对疫情影响，不断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贸易往来保持增长。全年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 1.3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0.7%（人民币计为 1.0%），占我国总体外贸的比重达到 29.1%。中欧班列的贸易大通道作用更加突显，全年开行超过 1.2 万列，同比上升 50%，通达境外 21 个国家的 92 个城市，比 2019 年底增加了 37 个。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加快，合作规划编制等相关工作扎实推进。

二是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全年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77.9 亿美元，增长 18.3%，占全国对外投资的比重上升到 16.2%；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911.2 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承包工程的 58.4%。一大批境外项目和园区建设在克服疫情中稳步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铁路等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中白工业园新入园企业 13 家。同时，沿线国家企业也看好中国发展机遇，在华新设企业 4294 家，直接投资 82.7 亿美元。

三是自贸区建设取得新突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是东亚区域一体化 20 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与柬埔寨签署自贸协定，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实施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关税减让安排。本周，还正式签署了与新西兰的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

四是机制平台更加健全。截至目前，中国与 171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 205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0 年，我们与缅甸、墨西哥、智利、白俄罗斯新建了贸易畅通工作组，还推动与更多国家建立投资工作组、服务贸易工作组和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同时我们还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包括举办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要展会，有力促进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

我们还以多种方式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编撰出版了《共同梦想》“一带一路”故事丛书第二和第三辑，目前丛书线下发行超过 31 万册，线上阅读量超过 4400 万人次，其中境外阅读量超过 1700 万人次。

2021 年，商务部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围绕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积极应对疫情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抗疫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战略、规划和机制对接，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水平，围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2、外交部：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是假，挑拨离间中非关系是真

【来源】新华网(2021-02-24)

【作者】潘洁、郑明达

【正文】针对一些西方国家政客精心编造的“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谎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表示，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是假，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中非关系是真。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中心负责人称，该中心在查阅中国在非洲开展项目有关对外贷款文件后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如果有关国家出现无法还债问题，中方会没收其资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不久之前，美国《大西洋月刊》也刊发了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是虚构的》文章，援引大量证据表明有关“中国制造‘债务陷阱’”的说法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客精心编造的谎言。

他说，在非洲国家整体外债构成中，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超过四分之三，在帮助非洲国家减轻债务负担上负有更大责任，没有哪个非洲国家是因为同中国开展合作而陷入债务困境的。当非洲国家出现经济困难时，中方始终愿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妥善解决办法，我们从不逼债，更不会要求签订什么“霸王条款”。同时，中方高度重视非洲减缓债问题，我们正遵照中非领导人共识和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积极回应非方关切，已同16个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中方还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15个非洲国家2020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是假，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中非关系是真。在这个问题上，凡是抱着公正的态度，都会得出客观的结论。

汪文斌表示，中国对非合作一贯坚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秉持公开透明、平等互利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有力促进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中国迄今已帮助非洲修建超过6000公里铁路、6000公里公路，建设近20个港口和80多个大型电力设施。中方参与投资建设的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肯尼亚内罗毕机场快速路项目，丰富了中非投融资合作方式，助力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中非合作坦坦荡荡，合作成果实实在在。

汪文斌说，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根本之道在于帮助和支持这些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实现更大发展。中国一直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一直致力于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非洲国家减债缓债作出努力。希望发达国家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重视非洲国家关切，加大力度减免非洲国家债务。

3、中国接连成为多方最大贸易伙伴意味着什么？

【来源】中国新闻网(2021-02-24)

【作者】李晓喻

【正文】疫情之下不少国家贸易“惨淡经营”，而中国却实现了新的飞跃。

据外媒报道，印度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印度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777亿美元。尽管这一数额与2019年相比有所降低，但足以使中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

同年，中国还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0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商品3835亿欧元，比上年增长5.6%；向中国出口商品2025亿欧元，增长2.2%。欧美贸易则比疫情暴发前明显缩水，欧盟自美进口、对美出口分别出现13.2%、8.2%的降幅。在欧盟前十大货物贸易伙伴中，中国是唯一实现贸易双向增长的。

另据德国官方最新数据，2020年德中贸易在疫情下逆势增长3%，总额达2121亿欧元。中国已连续第五年稳居德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官方此前表示，2020年中国外贸国际市场份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

中国一再成为主要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疫情防控和重启经济进度走在全球前列。

在其他国家因疫情纷纷“冻结”经济活动时，已经基本遏制住疫情传播的中国率先复工复产，凭借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大的生产能力，源源不断为海外提供急需的各类日用品和防疫物资。一些跨国公司更是将医疗用品、“宅经济”相关产品的产能转移到中国。在此情况下，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逆势增长也就顺理成章。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加快复苏也为扩大进口创造了条件。中方统计数据显示，随着经济实现正增长，民众收入增加，去年中国进口了近1.6万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品，其中肉类、首饰、化妆品进口增幅都在30%以上。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外贸这一变化影响深远。

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分量将越发重要。现在，作为贸易经济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其他国家要推动经济尽快走出低谷不容错过的合作伙伴。

一个例子是，据日本官方数据，得益于中国消费加速回暖，今年1月日本对中国出口同比大增37.5%，带动同期日本出口整体增长6.4%，连续第二个月上升。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副主任佩蒂亚·科娃·布鲁克斯所言，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之一，在供应链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近，主要经济体已在释放愿同中国加强合作的信号。七国集团（G7）日前在领导人会谈后公布联合声明称，本着帮助全人类拥有一个公平、互惠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目标，G7“将同其它各方展开合作，尤其是同囊括了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的G20国家合作”。

这也意味着，中国乃至全球贸易都将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称，中国作为全球消费市场、供应方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因此，中国外贸稳定增长不仅为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支撑，也有助于全球贸易复苏。

4、2020年来华直接投资同比增近四成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02-24)

【作者】邱海峰

【正文】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来华直接投资2130亿美元，同比增长37%，境外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介绍，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989亿美元，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2%，继续处于合理区间，跨境资金双向平稳流动，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货物贸易保持较高顺差。2020年，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为5338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收窄。2020年，服务贸易逆差1453亿美元，同比下降44%。直接投资延续较高顺差，证券投资双向交易活跃。2020年，直接投资顺差1034亿美元，同比增长78%。

王春英表示，总体来看，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推动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有利于中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5、2021年1月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来源】商务部网站(2021-02-27)

【编辑】林徽东

【正文】2021年1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4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08.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1%（折合16.8亿美元，同比增长5.7%），占同期总额的19.9%，较上年提升0.8个百分点，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尼、越南、阿联酋、马来西亚、土耳其、老挝、哈萨克斯坦、泰国和孟加拉国等国家。

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04份，新签合同额450.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9.4%（折合69.6亿美元，同比下降24.6%），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6.6%；完成营业额334.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1%（折合51.7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占同期总额的58.5%。

6、绿色是“一带一路”最动人的色彩

【来源】人民网(2021-02-27)

【编辑】林徽东

【正文】“一带一路”不仅是发展的，更是绿色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沿线国家找到绿色增长路径，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不仅满足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诉求，也满足其在碳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诉求。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日前报道声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全世界70%的燃煤电厂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目标却是在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领导作用”。有关报道无视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秉持的绿色发展理念，偏离事实，有失公允。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先来看一个例子。过去一年，虽然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中企承建的阿联酋哈斯彦清洁燃煤电站项目稳步推进，成功并网发电，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中东首个清洁燃煤电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项目，建成后将改变迪拜长期依赖进口天然气发电的历史，保障迪拜能源供应并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助力实现迪拜政府提出的2030能源战略规划。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建设者在工程中对环境保护的用心：不仅采用最先进的燃烧除尘技术，减少大气污染排放，还对施工区域内的2万余株珊瑚进行移植和培养，将周围海域的环境风险降至最低……“看看项目周边的海域，你会发现大海依然很清澈、很漂亮”，阿联酋海洋环境组织主席和创始人阿里·萨格尔对此深有感触。

这只是“一带一路”推动绿色发展的缩影。近年来，中国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打造起一个个造福当代、惠及未来的绿色项目。比如，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建成首个大型火电项目——巴基斯坦萨希瓦尔燃煤电站，填补了巴基斯坦近四分之一的电力缺口，能耗和排放指标均达国际先进水平；凭借先进的清洁燃煤发电技术，在环保要求异常严格、从未有燃煤电厂建设先例的新加坡落地了登布苏火电项目，改变了新加坡能源发展的历史。同时，中国还在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领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洁、多元化方向加速转型。

“一带一路”不仅是发展的，更是绿色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沿线国家找到绿色增长路径，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不仅满足了沿线国家的环境诉求，也满足其在碳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诉求。

从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到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100多个国家开展环保交流合作，中国贡献有目共睹。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大幅提升了近40%，超过了化石能源投资。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特殊、独特地位。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美发达国家有50至70年过渡期，而中国只有30年左右。中国不断自我加压，积极节能减排，就是对全球气候治理最大的贡献。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真正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少一些颐指气使，多一些绿色行动，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7、全国政协委员周勇：三句话阐释“一带一路”巨大效益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1-03-07)

【编辑】刘婷

【正文】在2021年3月7日上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第二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勇，用三句话阐释“一带一路”实施以来，为当地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他介绍，中国企业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2020年12月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巴基斯坦PKM高速公路项目移交通车，全长近400公里，打通了巴基斯坦中部南北交通动脉，成为当地百姓口中的致富路，也为中巴建交7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一带一路”的最大魅力在于不仅在于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更在于各国人民在互通有无、交流互鉴中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

周勇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埃及女工程师玛丽，她的母亲曾在40年前到中国深造，也是埃及最早一批学习汉语的大学生。如今，玛丽到中国建筑集团埃及公司工作。作为项目设计部一名工作人员，她不仅参与项目建设，还发挥语言优势，积极参与公司组织的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成为了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使者。周勇表示，像她这样的外籍员工还有很多，正是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坚定支持者、主动参与者越来越多，也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增添了亮丽色彩。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共建“一带一路”给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的空间，也给企业合作共赢搭建了新的平台，更增进了各国民生福祉。中国建筑集团海外员工有一个共同感受，古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正不断再现于世人面前。

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项目超过3400个，打造了一大批标志性工程，也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未来，将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打造新的精品工程、幸福工程和民心工程，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周勇说。

深度透视

1、乘风破浪 “克”疫而上——“一带一路”建设走向可持续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2021-02-28)

【作者】胡必亮

【正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情况广受国际社会关注。有人猜测，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资大幅减少；有人对相关债务

问题继续表示关切；也有人对“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煤电建设项目表示关注。同时，更多的人则关注着疫情下以及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和新趋势。

1、克服重重挑战，投资总量大幅增长

2020年，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倡议提出以来最多的一年，比2019年增长了18.3%，与几年来的年平均投资额相比，更是增长了18.9%。相应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由2019年的13.6%上升到了2020年的16.2%。

实际上，自“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秋季提出后，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就迅速地从上一年的10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了125.4亿美元；2015年继续增加到148.2亿美元，同比增长18.2%；在2016年和2017年稍有回落后，2018年超过了150亿美元，达156.4亿美元；2020年更是高达177.9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多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达1047.2亿美元，年平均投资额149.6亿美元。

从项目层面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最严重的一段时期，确实有一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短暂停工，但绝大多数项目都很快复工。不仅如此，中国与相关国家还于去年启动了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如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巴基斯坦科哈拉水电站等。去年，中国与日本、法国签署了在卡塔尔建设首个非化石燃料充电站的协议，还与乌干达签署了建设光伏电站的协议。

总之，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会因疫情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有任何改变。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匈牙利、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联合成立多边金融合作中心，并积极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更大空间，中国和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资将继续表现出总体不断增长的势头。

2、没有一个国家因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陷于债务危机

国家的债务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存在，而且不仅仅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洲一些国家爆发了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并且持续时间较长。

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债务快速增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许多国家都实施了财政刺激政策，比较典型的就美国和欧盟所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这直接造成了国际资本市场上资金总量大幅增加，且很多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总量多了，因此国际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也比较多，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也就有所增加。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增加了对沿线国家的资金支持，但中国从一开始就坚持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共商共建共享，与相关国家共同讨论建设项目，通过友好协商进行资金安排；二是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中国企业和相关国家的企业在市场原则基础上开展项目合作，项目资金也主要是企业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而得以解决，包括多元化的国际融资、PPP融资等方式，政府间直接借款的数量很少；三是坚持发展导向，建设项目的选择是根据相关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确定的，以确保项目建成后对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推进7年多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陷入债务危机。在少数人经常提到的斯里兰卡债务问题中，该国领导人前不久公开表示，斯对华债务只占其国家外债总额的12%，且该国债务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是来自金融市场的借款和多边机构的贷款。即使是对华债务，也主要是低息优惠贷款。而对于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建设项目，承建的中国招商局花一定数量的资金根据市场规则和公平交易原则购得70%股权以及租用港口和周边土地建设工业园99年，属于典型的市场行为，不应被政治化。再例如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债务问题，实际上 80%左右的项目资金都是由中国企业和巴基斯坦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企业依据市场规则获得的融资，只有约 20%的资金属于债务融资。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后，特别重视债务可持续性问题。2017 年，我国与 26 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2019 年，中国财政部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流程与标准、项目所在国债务风险分析、债务承受力压力测试、债务风险管理等提出了详细分析框架，以提升债务风险管理水平，提高建设项目经济效益。

对于那些出现偿债困难的国家，中国从不逼债，而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我国去年已经免除了有关非洲国家截至 2020 年底的无息贷款；为了减缓新冠肺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影响，我国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G20）缓债倡议，缓债额十多亿美元，约占 G20 缓债总额的近 30%，是 G20 中贡献最大的国家，甚至占到了 G7 国家缓债总额的 80%以上。

3、与相关国家共同推进能源转型发展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其中，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为严重的就是电力不足。由于缺电，这些国家很难发展制造业，农业现代化水平也很难提高。通过在这些国家新建一些发电站，可以直接增加其供电能力，对促进其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意义重大，能源项目也较多。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为例，由于巴基斯坦严重缺电，因此电站建设项目占有建设项目总数的 60%以上。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实施的基本政策是控制煤电发展规模。政府已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限制对涉煤建设项目的投资；中国人民银行于 2020 年修订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不再支持涉及煤和煤电等传统化石能源项目建设。

这样的基本政策也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譬如说，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电站，很多都属于可再生能源类型的，水电站就有卡洛特、玛尔、苏吉吉纳里、达苏、科哈拉、阿扎德帕坦等；除了水电站外，中国也在巴基斯坦建设了不少风电站，如萨菲尔、塔帕、玛斯特、萨察尔、哈瓦、特里肯波斯顿等，而且有些风电站如萨菲尔、塔帕等都已投入商业运行；还有核电站如卡拉奇核电项目和太阳能发电项目如建设在巴哈瓦尔布尔市的 100MW 光伏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除了在巴基斯坦大量地建设了很多清洁能源电站外，中国企业也在黑山建设莫祖拉风电站、在阿联酋建设迪拜光热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

但由于一些国家并不具备清洁能源发电的资源禀赋，而拥有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加上目前清洁能源发电成本仍然相对较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确实有一些煤电项目，譬如说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的萨希瓦尔电站、卡西姆电站等就是燃煤电站，但都采用了世界领先的清洁燃煤技术，碳排放量严格地控制在国际先进水平。

总之，中国正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相关国家一道，共同推进能源转型发展，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贡献；即便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仍然与有关国家共同建设煤电项目，也会通过运用世界先进技术而坚决做到低碳生产，清洁生产。

4、双循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动能

基于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所面临的新环境、新特点，中国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所谓“双循环”，一个循环就是指我国国内的经济循环；另一个循环就是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循环。通过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既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从国内经济循环来看，我国有十分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国内市场巨大，而且国内形成良性循环的条件也已具备。我国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也比较多，市场主体也多，因此不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市场空间都很大。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的积极支撑作用越来越

显著：2012年，我国消费占GDP比重还只有49.3%，不到50%，但2016年就超过了55%，2019年达57.8%，2020年的严重疫情给消费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因此稍有回落，为54.3%。

从国际循环来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中国的进口以及中国的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增长。

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同年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144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我国成为去年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有人大肆鼓吹“脱钩”和“去全球化”，实际上并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相反，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以及其他联系只会越来越强。

“一带一路”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依托这一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已经在贸易、投资、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1%，其中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了7%；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直接投资大幅增长了18.3%。在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与投资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上，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于2020年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对促进整个地区以及各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对各相关国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在该区域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

5、数字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机遇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易、交流方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进而直接促进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新业态发展，尤其是直接促进了网上购物、网络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游戏等基于数字技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我国已与16个国家签署了数字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2个国家共同打造“丝路电商”合作平台。为了协助“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抗击疫情，中国医疗专家去年通过视频会议方式与很多国家的同行交流防疫和诊疗经验。

中国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这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提供了有益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发展中国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快速推进的新发展时期，如果能够有效地促进数字化转型发展，就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其现代化发展路程不仅将缩短，而且还能更好地满足联合国2030年议程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了赢得这次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目前应特别重视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助力防疫抗疫工作取得更好成效。譬如说中国通过扫描健康码而对人们的新冠肺炎感染情况进行有效辨识的数字技术，就很值得“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借鉴和推广运用。又比如说，通过视频会议交流防疫抗疫经验、通过远程医疗方式实行有效会诊等都直接有助于各国的防疫抗疫工作取得更好效果。

二是除了重视传统基建外，需要加强新基建建设。通过5G等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转型发展进程，促进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城市、信息产业等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三是秉持公平正义和多边主义，共同维护数据安全。我国已于2020年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共同努力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安全和稳定，反对利用信息技术破坏或窃取他国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数据、侵害个人信息或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监控，不得强制要求本国企业将境外数据存储在境内或直接向企业调取境外数据，企业不得在产品和服务中设置后门，等等。

四是在数字化时代，要特别注意采取多方面的有效措施，防止因为“数字鸿沟”问题导

致部分国家和部分人民陷于新的贫困。

2、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答记者问 “一带一路”成焦点

【来源】人民网(2021-03-08)

【编辑】张广琳

【正文】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王毅表示，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但各方对“一带一路”的需求没有改变，中方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更没有改变。

王毅表示，去年以来，疫情给世界造成全方位冲击。“一带一路”合作没有按下“暂停键”，反而逆风前行，取得新的成果，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

王毅说，我们以“共商”为引领，成功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及30多场专业会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我们以“共建”为方向，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重点项目没有一例因疫情而停工，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匈塞铁路等进展良好，为当地稳经济、惠民生做出重要贡献。我们以“共享”为重点，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货物运量均创历史新高，“陆海新通道”沿线运量同比倍增，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王毅指出，疫情阻碍了人员往来，但阻隔不了伙伴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的投入和支持。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努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通过抗疫国际合作，使“一带一路”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我们搭建“数字丝绸之路”，积极建设“信息走廊”，使“一带一路”永远在线。我们深耕“绿色丝绸之路”，加强绿色能源、绿色基建、绿色金融合作，使“一带一路”成为全球低碳转型和疫后绿色复苏的重要引擎。

王毅表示，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但各方对“一带一路”的需求没有改变，中方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更没有改变。中国将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优路径，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带来更多机遇。我们愿同各方一道，确保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动能不减、韧性更强，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各方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中俄将打造互利合作的典范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双方已商定将条约延期，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是中俄关系的里程碑，更是新起点。双方将弘扬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的条约精神，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我们将打造战略互信的典范，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核心重大利益，联手反对“颜色革命”，打击各种虚假信息，维护各自主权和政权安全。

我们将打造互利合作的典范，深化“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经贸投资合作提质升级，拓展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我们将打造民心相通的典范，弘扬传统友好，促进人文交流，让中俄友谊薪火相传。

我们还将打造公平正义的典范，携手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中非永远命运与共

王毅说，当前，帮助非洲各国抗击疫情、复苏经济是中非合作的重中之重。去年，习近平主席倡导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援非举措。迄今中方已向非洲提供近120批紧急抗疫物资，向15个国家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已经并将向35个非洲国家及

非盟委员会提供疫苗，中方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项目已正式开工，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正抓紧推进。

今年，我们将在塞内加尔举行新一届论坛，我们愿以此为契机，支持非洲彻底战胜疫情，强化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支持非洲加快工业化建设，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加快一体化进程，融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支持非洲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维护非洲大陆的和平稳定。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构建更紧密命运共同体，将为非洲发展振兴提供源源不断动力。

中阿团结抗疫树立新典范

王毅表示，面对疫情冲击，中阿关系去年逆势前行，继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中阿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成功召开，双方一致同意举行中阿峰会。中阿政治关系开启了新篇章。

沙特国王是第一个致电习近平主席支持中国抗疫的外国元首，阿联酋是第一个接受中国疫苗境外Ⅲ期试验的国家。中阿团结抗疫树立了新典范。

去年，中阿贸易额达到2400亿美元，中国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阿“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有序推进，5G、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合作方兴未艾。中阿务实合作迈上了新台阶。

阿拉伯谚语说，友谊是树，忠实为根，亲善为枝。中国愿同阿方一道努力，精诚团结，携手共进，共同筹备好中阿峰会，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新内涵，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新成果。

3、两会聚焦：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03-10)

【作者】严瑜等

【正文】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开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代表委员们表示，中国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拥抱世界的自信与担当。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将同世界各国共享更多发展机遇，助推全球经济恢复与发展。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

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重大举措陆续推出、成功举办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20年，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持续加快，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决心坚如磐石。

“尽管逆全球化思潮在一些国家抬头，但国际合作的步伐从未停歇。过去一年，中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举办进博会、服贸会等国际经贸盛会，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乐于与全球分享市场机遇的明确信号。”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去年曾赴浙江义乌、广东深圳等地考察。“在义乌，我看到借助电商平台以及中欧班列，国际商贸往来并未因为疫情而严重受损。在深圳，一些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在研发新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同时，也与国际市场快速接轨。”季志业表示，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逆势增长，可喜成绩的背后是扩大开放政策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阳泉市市委书记姜四清说：“‘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我们要在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拓展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上下功夫，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

为世界经济注入动力

中国将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各国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更多动力。

——习近平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扩大相互开放，实现互利共赢。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表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中国对外开放将更注重体制机制与国际惯例、国际通行规则全面接轨。政府工作报告释放的积极信号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方向没有改变，将努力扩大“朋友圈”，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市场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政府工作报告反映了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表明中国继续扩大开放，与世界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的意愿。”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晓东认为，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多样化和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以及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在‘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得到充分体现。”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国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乃科表示，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分值得期待。

积极开展广泛合作

我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凡是愿同中国合作的国家、地区、企业，我们都会积极开展合作。

——习近平

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宽，程度不断加深，吸引更多外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紧密。“2020年中国经济复苏走在世界前列，充分展示了中国市场的澎湃活力。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市场，正是因为对中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韧性有信心。我们必须提升自身能力，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合作。”季志业建议，中国应进一步集中精力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完善自身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高发展质量，向世界展现出持久的吸引力。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蔡庆锋建议，一方面，要持续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另一方面，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建立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与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管理方式。

“中国现有的21个自贸试验区给国际投资者及海外侨胞创造了很好的投资机会。‘十四

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广大海外侨胞也大有可为,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寻求更好发展。”陈乃科说。

交流成果

一、学者成果

1、“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合作问题研究

【来源】《对外经贸》(2020年第12期)

【作者】廖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赵灿蒙

【摘要】通过统计数据和指标分析当前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的结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发现当前中国在中东欧地区贸易投资分布极不均衡,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潜力有待充分释放,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亟需提升。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政府应继续强化与中东欧各国的战略共识,积极打通中东欧这一关键节点;根据中东欧各国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差异,有计划、有步骤实施差异性策略;健全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形成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民共进”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中东欧; 贸易投资便利化; 贸易潜力; 投资合作

【正文】一、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国不同程度地采取停工停产、封锁边境等措施遏制病毒传播,导致商品、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阻。加之,近几年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倾向,各国对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将更加谨慎,基于全球分工的生产体系和贸易格局也将面临重构。自2012年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正式启动以来,双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深度不断扩展,经贸往来更加频繁,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互联互通规划逐步推进,金融、保险、旅游、教育、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的顺利对接。2019年4月,希腊的加入使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由“16+1”升级为“17+1”。目前中东欧17国中有12个是欧盟成员国,因此,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对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有益补充,并为“一带一路”地区合作提供了借鉴模式。中东欧各国作为中国与欧盟能量交换的关键一环,对“后疫情时代”中欧贸易的复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分析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合作的结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并为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中东欧的贸易投资合作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投资现状与问题

(一) 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现状

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2007—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贸易总额由2007年的332.51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894.63亿美元,年增长率达9.41%。其中,中国自中东欧17国的进口额从2007年的49.2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36.13亿美元,年增长率达15.31%;中国对中东欧17国的出口额从2007年的283.26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58.5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7.97%。

从时间趋势上看,中国与17国的贸易在波动中上升。尽管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的双边贸易额出现大幅下降,但2010年很快强势反弹。特别是2012年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双边贸易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与全球低迷的贸易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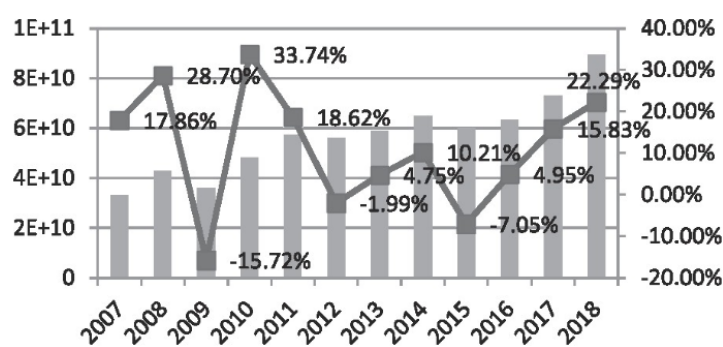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贸易总额和贸易增长率（单位：美元）

从国别结构来看，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贸易关系存在较大差异，贸易国别相对集中。2007—2018年，在中国与中东欧17国的双边贸易中，贸易额占比排名前五的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新成员希腊2018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中东欧贸易总额的7.94%，超过罗马尼亚，居于第五位。2018年，该六国在中国与中东欧的双边贸易总额中占比82.47%。2018年，中国从中东欧17国的进口额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占比分别为22.21%、18.66%、18.37%、15.44%和9.19%，中国从这五个国家的进口额占中国从中东欧17国进口总额的83.87%；中国对中东欧17国的出口额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波兰、捷克、匈牙利、希腊和罗马尼亚，占比分别为31.81%、18.09%、9.93%、9.93%和6.85%，中国对这五个国家的出口额占中国对中东欧17国出口总额的76.61%。但近两年来，贸易国别结构集中度有下降趋势，贸易额占比前五的国家在中国与17国贸易中的比重从2015年的75.87%下降到2018年的74.55%。相比之下，原来在中国与17国贸易中占比较低的国家近年来比重有所上升，表明双边贸易结构更趋于合理。

（二）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现状

投资方面，据商务部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为1430.4亿美元,同比下降9.6%，继续呈现收缩的态势。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17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四，较2018年收缩260亿美元，连续三年下降，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理性和稳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经历了爆发式增长过程，表现在2009—2010年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的一个跳跃式增长，随后在一个较高位置上平稳增长。2010年中国对中东欧投资流量同比增加972.8%，达到4.19亿美元。之后2014年和2017年两次大幅度的投资流入，特别是2017年在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投资收缩的时候，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却逆势增加226.7%，可见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2007—2018年，中国对17国的投资存量由2007年的3.01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5.1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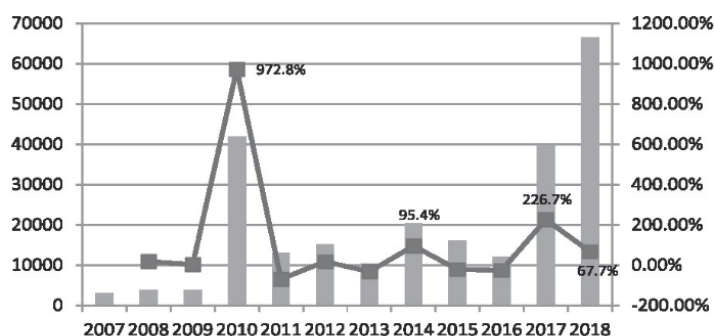


图2 2007—2018年中国对中东欧17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增长率（单位：万美元）

从国别来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和塞尔维亚等国家，2018年底中国在此五国的投资存量占17国的67.63%。从流量变化来看，近两年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愈趋分散，除传统投资目的国外，对黑山、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希腊的投资增加，

对爱沙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开始有新增投资流入。2018年,中东欧国家中吸引中国投资流量前五的国家分别是塞尔维亚、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爱沙尼亚。

从中国对中东欧17国历年的投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对中东欧17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但对各国增速存在明显差异。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梯度,第一梯度为50%以上的增速,分别是希腊、黑山和塞尔维亚三个国家。其中希腊的年均增长率最高,是85.39%,其次黑山年均增长率为61.84%,第三位是塞尔维亚55.94%,其中对塞尔维亚投资较广,涵盖机械、化工、物流等各个方面。第二梯度是年均增长率在20%-50%的国家,分别是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捷克。这些国家投资进程良好,年均增速较稳定适中。第三梯度是20%以下的几个国家,其中克罗地亚为17.43%,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这几个国家的年均投资增速在15%左右,与希腊和黑山、塞尔维亚等国存在一定差距。拉脱维亚的年均投资增长率仅为5.99%,波黑处于最后一位,年均投资增长率仅为2.15%。由此可见,各国年均投资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存量较小的国家投资增量增长较快,存量较大的国家投资增速增长较慢,总体走向更加均衡。

(三) 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存在的问题

第一, 贸易投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存量分布明显失衡。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波兰的投资额最多,在波黑的投资额最少。投资额较大的前四位是波兰(20.84%),匈牙利(12.76%),罗马尼亚(12.12%)以及捷克(11.11%),这四个国家的投资额占据了中东欧17国的3/5,而其他国家如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投资额仅处于1%以下。前三位国家的投资额是后三位国家获得投资额的近200倍,投资额的明显分布不均与各国所处的投资环境有必然联系。

第二, 贸易投资便利化有待提升

中国与中东欧地区投资便利化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在铁路公路、内河运输等交通体系方面,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尤为落后,设施不完备不仅影响中欧国际运输,也对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决策造成很大影响。二是通关质检过程滞后。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欧物流系统合作取得很大进步。但通关、质检仍存在很多不便,且相关改进措施只在很少一部分国家推进。三是投资模式有待创新。由于中东欧17国中有12个为欧盟成员国,其他5个(阿尔巴尼亚、黑山、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波黑)也在积极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根据欧盟法律环境的约束,其成员国可以为外来融资提供主权担保的余地较小。对于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东欧国家首选的合作模式是公私合营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和建设—运营—转让BOT(Build-Operate-Transfer),这两种模式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需要与政府打交道并熟悉相关法律规定,中国企业要积极评估风险和收益,调整适应新的投资模式。

第三, 贸易投资潜力有待充分释放

中国—中东欧贸易互补性强,双边合作的贸易潜力巨大。从显示性比较优势来看,中国主要在工业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占中国出口中东欧产品的95%。而中东欧国家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主要是农产品、矿物燃料等初级产品以及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双方具有产业互补的优势。目前中国—中东欧贸易结构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双方在农产品等领域的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另外,中东欧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等领域亟需合作,而我国在装备制造、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领域具备优势,投资合作的潜力巨大。

三、加强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合作对策建议

(一) 构筑新中东欧“大通道”, 缩短中国欧盟贸易距离

当前,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也对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格局提出挑战,国家经济力量的变化

促使多边机制陷入博弈困境。现阶段,全球经济秩序正处于新旧动能、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基于自身利益提出各自的全球贸易领域治理方案,旨在抢夺贸易领域的话语权。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18年至今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中,欧盟各国特别是德国、法国、英国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反映较为理性,均明确表达了反对贸易保护、贸易限制的立场。构筑新中东欧的“大通道”,缩短中国欧盟贸易距离是促进中欧贸易的关键所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东欧国家成为实现中国与欧盟经济能量交换的最关键一环。目前,明确在“一带一路”架构下进行的“中欧陆海快线”一旦建成,将大大拉近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距离,“中欧陆海快线”南起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北至匈牙利布达佩斯,比传统航线缩短7—11天运输时间,为中国商品输往欧洲开辟了新的便捷通道。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腊最大港口,被称为“欧洲的南大门”。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至中东欧的货运列车,又将比港与欧洲腹地连接,大幅缩短了运输时间。

继续强化“共同体”的战略共识。“打造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赢得广泛国际支持的重要前提。在“一带一路”发展至新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一定进展的情况下,政府要积极探寻沿线国家的经济诉求,利用与沿线国家的产业优势差异,通过对话沟通的方式将中国产业发展意愿与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将建设“共同体”推至一个新阶段,这样可以为中国企业营造更加公平、更加融洽的贸易投资环境,在促进中国企业投资积极性的同时提升沿线国家的社会福利,实现“一带一路”的共赢发展宗旨。

(二) 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充分挖掘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潜力

中东欧国家根据经济与地理位置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波罗的海三国,均为高收入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它们是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都较为发达。第二类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与斯洛文尼亚,它们是中东欧地区的工业发达国家。第三类是巴尔干半岛八国,他们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特色产业较为突出。希腊则地理位置优势突出,航运业发达。由于中东欧17个国家经济水平发展参差不齐,各国在开放程度、国内营商环境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发展诉求也不一致,这些都意味着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要有步骤、有计划采取差异性策略。

鼓励企业根据各国投资环境和资源禀赋的不同,选择其中行业特色鲜明且国际竞争力较强的行业进行投资,在获取资源、技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制造和中国技术发扬光大,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提升。积极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规模,增加从中东欧国家进口商品,使双边贸易得到健康平衡发展。过去几年,中国致力于促进中国—中东欧贸易,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举办中东欧特色商品展、召开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博览会、举办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将中东欧各国的特色商品引荐到国内,如捷克的水晶制品、保加利亚的葡萄酒和玫瑰精油化妆品、立陶宛的奶制品等,在展会的推动下,这些产品在华知名度得到大大提高。但由于地理距离、产能限制等原因,中东欧国家对华出口潜力还需进一步挖掘。应加速促进双边海关程序的透明化,探索新的跨境合作方式,优先化解阻碍贸易畅通的壁垒和障碍。加强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推进农产品的深加工贸易。改善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环境,推动双方在检验检疫、标准互认等方面取得进展。

(三) 健全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形成“国民共进”发展格局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提升所带来的投资促进效应高于贸易效应,由此可见,中东欧市场对中国企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为了促进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中东欧”市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树立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健全企业“走出去”的服务体系。由于在“一带一路”市场开拓初期,国有企业基于自身规模及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敏感性,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头羊,特别是倡议初期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优先实现过剩产能转移。在国企“走出去”的进程中,要摒弃以量取胜的

观念,树立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加大 R&D 投入,制定有效的创新人才激励举措,进一步健全企业“走出去”的服务体系。一方面,在签订国家层面双边协定时要充分考量风险防控问题,特别是政治、宗教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国内要在金融、财税政策上对企业加强扶持力度,将企业“走出去”金融风险最小化。第二,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对接中东欧 17 国带来的大市场。民营企业在经营上更接地气,在呼应市场需求上更加灵活,特别是一批“专精特新”新型中小企业更成为科技创新的黑马。

“一带一路”推进初期,国企已然占据先发优势,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打造“国民共进”的新模式。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民营企业的优势,支持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对“专精特新”企业在金融和财税政策上给予倾斜,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另一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和“先出发”的国有企业构建协同合作的关系,实现创新成果高效市场化,使得国企、民企都充分享受“一带一路”倡议的红利,最终带动中国产业整体转型升级。

2、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比较

【来源】《统计与决策》(2021 年第 1 期)

【作者】江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博士,讲师),

郭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博士,讲师)

【摘要】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有力推动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文章基于 2003—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 49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考察了中国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与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相应的贡献度做比较。结果显示,中国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普遍性、高效性、循环性等特点:中国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从整体上看,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相应的贡献度要大;中国直接投资有助于东道国走向投资和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发展道路。

【关键词】直接投资;“一带一路”;经济增长;贡献度

【正文】0 引言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双方经济增长都产生巨大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能通过带动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母国的经济增长。

现有文献关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贡献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一些空白。本文中贡献度是指单位数额(如:万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首先,东道国在吸收中国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吸收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关于这两种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否有差异,已有研究中尚未涉及。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因此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此外,以往文献通常以地理区域划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接受中国直接投资程度的差异性,可能会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产生影响。

综合以上原因,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相比较,谁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度更大?第二,中国及其他国家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怎样的改变?第三,东道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接受中国直接投资的程度是否影响了中国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1 模型、数据与方法

1.1 计量模型

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所在国经济增

长的影响。所在国的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所在国的直接投资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选取所在国的居民受教育水平、工业水平、经济对外依存度、劳动投入等作为影响该国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所得模型如下：

$$\ln(gdpgr_{it}) = \alpha + \beta_1 cfdi_{it} + \beta_2 ofdi_{it} + \beta_3 X_{it} + \gamm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表示不同国家， t 表示年份； $gdpgr_{it}$ 表示人均 GDP 年增长率； $cfdi_{it}$ 为中国对所在国的直接投资额（万美元）； $ofdi_{it}$ 表示除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在所在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万美元）； X_{it} 是控制变量的集合； γ_i 是不同国家的个体固定效应； λ_t 是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是误差项。控制变量的集合 X_{it} 为：

$$X_{it} = \theta_1 literacy_{it} + \theta_2 indgdp_{it} + \theta_3 tradegdp_{it} + \theta_4 labor_{it} \quad (2)$$

其中， $literacy_{it}$ 是 15 岁以上人口的总体识字率； $indgdp_{it}$ 表示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 $tradegdp_{it}$ 表示对外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 $labor_{it}$ 表示 15 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1.2 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03—2017 年的世界银行数据库以及相应年份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取标准为中国及其他国家 2003—2017 年在该国有一定规模的直接投资且有相关的数据。符合本文标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 49 个。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人均 GDP 年增长率作为该国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 核心解释变量。中国对东道国的年度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在东道国的年度直接投资总和（简称“他国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与《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为所在国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与当年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额之差。

(3) 控制变量。所有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中总体识字率代表所在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代表该国的工业水平；对外贸易额占 GDP 比例代表该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劳动参与率代表该国劳动投入水平。

1.3 样本划分

在对 49 个国家 2003—2017 年数据进行全样本回归分析的同时，本文还对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以往多数文献在划分样本时，往往以地理区域进行划分。相同地理区域的国家固然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在分析中国及他国直接投资对所在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时间和经济因素具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本文对样本的划分标准如下：

(1) 时间划分。2008 年世界范围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对有关各国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国在 2008 年及之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普遍较小，而在 2008 年之后快速增长。鉴于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在 2008 年前后的数据区别显著，本文首先将 2003—2017 年的数据按时间划分为前 6 年（2003—2008 年）和后 9 年（2009—2017 年）两个分样本。

(2) 东道国收入水平划分。本文研究的 49 个国家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且差异很大，按照 2017 年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为标准，将世界各国划分为高收入国家（>12055 美元）、中上收入国家（3896~12055 美元）、中下收入国家（996~3895 美元）和低收入国家（<996 美元）。为了研究中国及他国直接投资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相同，本文参照该标准，将 49 个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12055 美元）、中上收入国家（3896~12055 美元）、中下收入及低收入国家（<3896 美元）三个分

样本。其中将低收入国家和中下收入国家合并是因为这两个组别的样本国家数量和前两个组别有较大差异。

(3) 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程度划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差别很大,为衡量中国在各国的直接投资程度,本文以各国2003—2017年的年人均中国直接投资额为标准,将49个国家的该项值从高到低排序。按此排序,第25名的国家为斯洛伐克(年人均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69美元),将斯洛伐克及前24名国家分为一组,即年人均中国直接投资较高的国家样本;将年人均中国直接投资额低于1.69美元的后24名国家分为一组,即年人均中国直接投资较低的国家样本。

表1为按收入水平划分(横向)以及按中国直接投资程度划分(纵向)的49个国家列表。

表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样本列表  [下载原表](#)

		按所在国的中国直接投资程度划分	
		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高的国家(25个)	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国家(24个)
按所在国收入水平划分	高收入国家(14个)	斯洛伐克,匈牙利,新加坡,文莱,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沙特	波兰,捷克,克罗地亚,阿曼,巴林,以色列
	中上收入国家(16个)	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泰国,伊朗,马尔代夫	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土耳其,黎巴嫩,约旦,阿塞拜疆
	中下收入及低收入国家(19个)	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塔吉克斯坦	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埃及,格鲁吉亚,尼泊尔,也门

1.4 估计方法

本文采用广义线性模型(GLM)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的混合模型(GLMM)进行估计,以

消除内生性和空间自相关性。Tobler(1970)提出了某位置上的数据与其他位置上的数据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问题,如果不控制这个要素则无法保证模型的高效性和无偏性。外国投资和工业产量在国家间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即可能存在潜在的相互依赖性。同时,和所有贸易投资模型一样,内生性及其引发的估计参数不一致问题不可避免。这主要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首先,不能穷尽所有的相关解释变量(或不可测量的变量),如对象国的政治稳定程度等。政治稳定程度和外国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其被纳入误差项则必然引起内生性问题。其次是对模型中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客观存在。最后,在上述模型中,GDP增长率和外国直接投资、工业占比和识字率等变量可能互为因果,如GDP增长可能会吸引外资和提高识字率,而后者也可能影响前者。采用GLMM模型可将因变量的分布推广至指数分散族,从而消除了因变量和误差项必须具有正态性的假设而带来的不确定性。

表2 全样本和时间分样本回归结果  [下载原表](#)

	Ln(gdpgr) (2003—2017年)	Ln(gdpgr) (2003—2008年)	Ln(gdpgr) (2009—2017年)
cfdi	5.74e-06*** (7.44e-07)	6.26e-06*** (1.98e-06)	2.03e-06*** (4.22e-07)
ofdi	1.14e-07*** (2.71e-08)	1.52e-07*** (2.89e-08)	1.77e-08 (2.26e-08)
literacy	0.0184983** (0.0079233)	-0.0058178 (0.0160883)	0.0485363 (0.0126532)
indgdp	-0.0047099 (0.0031527)	-0.003456 (0.0038408)	-0.0034832 (0.00442)
trade_gdp	-0.0015035 (0.0014019)	0.0011679 (0.0028739)	0.0028603** (0.0013694)
labor	0.0179788* (0.0107087)	0.0514308 (0.0385016)	0.0581951*** (0.0129277)
R ²	0.2725	0.2715	0.2875
observations	578	197	381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回归分析前,先进行变量间相关系数检验。相关系数检验结果的VIF值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2.1 全样本和时间分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将全样本(49国,2003—2017年)和时间分样本(49国,2003—2008年和2009—2017年)纳入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2003—2017年cfdi和ofd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前者的系数较大。这说明中国和他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都对当地经济增长（人均 GDP 年增长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中国直接投资比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贡献度更高。学者们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在哪些领域可以更好地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时发现，当外资明显提升东道国的就业量时，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较快，而就业量和行业特点密切相关，制造、建筑、采掘等行业对就业的创造效应最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1 年中国对东盟国家这三个行业的直接投资额占当年中国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总额的 24.7%，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对东盟国家上述行业直接投资占总直接投资的比例。同年中国对俄罗斯上述行业的直接投资额高达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总额的 50.3%。可以看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就业创造效应明显的行业的高比例直接投资带动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直接投资比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度更高的重要原因。

将 2003—2017 年的样本分为前 6 年（2003—2008 年）和后 9 年（2009—2017 年）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前 6 年中国和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人均 GDP 年增长率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后 9 年中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影响仍然正向显著，但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影响则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其原因之一在于 2008 年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幅更是高于对全球直接投资的平均增幅，使得东道国各行业特别是明显推动经济增长行业里的中国直接投资比例持续增加，相应的他国直接投资比例逐步减少，使得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贡献度虽然为正，但不再显著。

2.2 国家分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将 49 个国家分别按收入水平和中国直接投资程度划分国家分样本，纳入模型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不同国家分样本回归结果 [下载原表](#)

	Ln(gdpgr)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			Ln(gdpgr) 中国直接投资不同程度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上收入国家	中下收入及低收入国家	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高国家	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低国家
cfdi	4.29e-06*** (1.03e-06)	0.0000111*** (2.31e-06)	4.42e-06*** (1.27e-06)	5.79e-06*** (1.03e-06)	4.37e-06*** (1.04e-06)
ofdi	2.58e-07*** (5.59e-08)	1.84e-07*** (6.29e-08)	9.27e-08*** (4.69e-08)	5.42e-08*** (4.07e-08)	1.06e-07*** (2.99e-08)
literacy	0.0032651 (0.0109758)	0.0115267 (0.0120953)	0.0070431 (0.0113379)	0.0005684 (0.0147018)	0.0774621*** (0.0141166)
indgdp	0.0293871*** (0.0091099)	-0.0033185 (0.0052018)	-0.0076064* (0.0041262)	-0.0090975** (0.0038432)	0.0128279 (0.0109594)
tradegdp	-0.0020497 (0.002713)	-0.0002434 (0.0025028)	-0.0018256 (0.0021236)	-0.0026012 (0.002433)	-0.0024931 (0.0020405)
labor	-0.0322374*** (0.0161836)	-0.0105897 (0.0162469)	-0.0139553 (0.0147321)	0.0615075*** (0.0247076)	0.0689883*** (0.0184931)
R ²	0.3172	0.3115	0.1959	0.2859	0.3979
observations	184	178	216	287	291

从表 3 可以看出，2003—2017 年中国和他国直接投资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以及接受中国直接投资程度不同的国家的人均 GDP 年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贡献，而中国直接投资对所有类别国家人均 GDP 增长的贡献度都要高于相应的他国直接投资。原因如同上文所述，中国在所有类别国家里那些明显推动经济增长的行业中直接投资的程度比其他国家要高，因而对东道国经济的贡献度也较高。

单就中国直接投资而言，其对中上收入水平国家经济贡献度最大，中下收入及低收入水平国家次之，高收入国家最小。大多数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仍处于工业化时期，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工业领域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中国直接投资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贡献度要高于对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贡献度。另一方面，中国直接投资对其程度较高国家的经济贡献度要大于对其程度较低国家的经济贡献度。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会严重制约其经济的发展。林云（2017）研究了中国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中国对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有力推动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而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周期长、投资大的特点，因此有中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往往是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高的国家。

2.3 国家分样本和时间分样本综合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收入水平以及中国直接投资程度的国家分样本可以分别和时间分样本结合，交叉分析其回归结果。下页表4中比较的是中国和他国直接投资对所在国人均GDP年增长率的贡献度，因为篇幅所限，只显示cfdi系数（中国直接投资，以1表示）和ofdi系数（他国直接投资，以2表示），系数显著表示对东道国经济贡献度显著，两系数都显著时系数较大代表贡献度较大。

如表4所示，中国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所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大于他国直接投资的相应贡献度。唯一的例外是2003—2008年，中国直接投资对中上收入国家、中下收入及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显著，而同一时期他国直接投资的相应贡献作用显著。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投资量较小，尚未对东道国经济产生规模效应，他国直接投资仍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但随着2008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并逐步取代东道国经济中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力，2009—2017年中国直接投资的贡献度已变为显著，而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度变为不显著。

表4 国家分样本和时间分样本综合回归结果1  [下载原表](#)

		2003—2017年	2003—2008年	2009—2017年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	高收入国家	1>2	1>2	1>2
	中上收入国家	1>2	1不显著,2显著	1显著,2不显著
	中下收入及低收入国家	1>2	1不显著,2显著	1显著,2不显著
中国直接投资不同程度国家	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高国家	1>2	1>2	1显著,2不显著
	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低国家	1>2	1>2	1显著,2不显著

在高收入国家、中上收入国家、中下收入及低收入国家样本中分别以H、M、L表示；在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高国家和较低国家样本中分别以HI、LI表示。

表5 国家分样本和时间分样本综合回归结果2  [下载原表](#)

		2003—2017年	2003—2008年	2009—2017年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	高收入国家	M>L>H	只有H显著	M>L>H
	中上收入国家			
	中下收入及低收入国家			
中国直接投资不同程度国家	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高国家	HI>LI	LI>HI	HI>LI
	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低国家			

表5分析了中国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贡献度。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贡献度最大的是中上收入国家，其次是中下收入及低收入国家，再次是高收入国家。2003—2008年中国直接投资对所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仅在高收入国家显著，原因在于这一期间中国在中下收入国家投资尚小，因而在这些国家的贡献度并不显著。但2008年后中国对中下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大幅增长，所以中国直接投资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贡献度整体上要高于对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贡献度。此外，中国直接投资对中上收入国家经济贡献度要高于对中下收入及低收入国家经济贡献度，因为前者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等均高于后者，中国在前者的直接投资可以更快更明显地推动当地经济增长。

2003—2008年，在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国家，中国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大于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高的国家。原因在于中国对后者的投资很大比例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基础设施建设耗资大、周期长的特点使得中国直接投资在这一期间对东道国贡献度没有完全体现。这一结果在2009—2017年得到了逆转，并且从整体上看（2003—2017年），在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国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贡献度大于其在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低国家的经济贡献度。

3 结论

中国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度具有普遍性，即其贡献度在所有类型国家都得到体现。本文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在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

家,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都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一部分国家接受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高,另一部分则较低,而中国直接投资对这两类国家经济贡献度都是显著的。

中国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度与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相比具有高效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无论是何种收入水平或者接受中国直接投资程度的国家,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贡献度。

中国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具有良性的循环性。中国直接投资对中下收入或低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帮助其向中上收入水平国家迈进。一旦该国进入中上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其相应提高的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劳动者素质又使得中国直接投资对该国的经济贡献度提高,因此中国直接投资又更有利于促进该国由中上收入水平国家向高收入水平国家迈进。与此同时,中国直接投资对该国经济高效的贡献度会激励该国采取措施吸引更多的中国直接投资,而一旦该国由原本接受中国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国家变为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国直接投资对该国经济的贡献度也会变大,进一步刺激其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中国直接投资和东道国经济增长有良性的循环性。

3、“一带一路”视阈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探究——基于两所地方高校的比较分析

【来源】《安康学院学报》(2021年2月第33卷第1期)

【作者】王艳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商务英语研究开发中心教授,博士),贾涵

【摘要】本研究以两所地方高校为例,通过研究其商务英语专业培养方案及访谈教学教研室/专业主任,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元素在商务英语专业建设中的融入度,探究两校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差异并提出改进措施。认为新时代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应包含: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兼备的专业素养建设、具有民族情怀的人文素养建设及胸怀天下且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建设。

【关键词】“一带一路”; 商务英语; 人才培养体系

【正文】一、引言

商务英语专业作为“语言+商务”跨学科复合型专业,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展现出越来越强势的发展趋势。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有370余所高校的商务英语本科专业正式招生,这是外语专业主动适应国家需求、服务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随着“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提出,商务英语专业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满足社会和企业“走出去”对人才的需求,2018年1月,教育部正式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这对于商务英语专业坚持质量发展和内涵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新时代教育的目标——努力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国现有的商务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虽在各校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都是依据《国标》和全国教育大会等会议精神的要求设计制定,这体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的指引。面对新时代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各高校对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不论是“商”的专业知识,还是“英”的交流能力,或是“国”的政治素养,都需要满足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新征程上的人才需求。本研究分别选择以外语类专业为特色的高校和以商贸类专业为特色的高校,收集并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元素在两所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建设中的融入度,探究不同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差异,提出新时代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设想,以期为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贡献高质量的商务

语言教育服务。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分别选择以外语类专业为特色和以商贸类专业为特色的两所公立大学为研究对象, 为便于表述, 以下将前者简称为A校, 将后者简称为B校。样本概括如下页表1所示:

表1 两所地方高校对比  [下载原表](#)

	性质	特色
地方高校 A	本科; 公办	外语类
地方高校 B	本科; 公办	商贸类

(二) 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比较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为主, 结合访谈等其他手段, 对两所地方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方案及教研室主任的访谈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旨在回答两个

问题: (1) “一带一路”相关元素在两所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是如何体现的? (2) 地方高校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提高“一带一路”元素在人才培养中的融入度?

对于第一个研究问题,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 从两校培养方案出发, 结合与两校教学教研室/专业主任以及个别老师的交流访谈, 对比宏观层面上两校人才培养方面的异同, 分析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是否体现了“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人才需求特质。对于第二个问题, 本研究在对前一个问题的分析基础上, 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背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国内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对接“一带一路”人才需求的侧重点, 以期提高商务英语专业建设水平, 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发展倡议。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培养方案对比

1. 培养规格/培养要求

关于对培养方案中培养规格/培养要求的对比, 如表2所示, A校和B校都是从“知

表2 培养规格/培养要求对比  [下载原表](#)

	A校	B校
知识	商务语言知识、国际商务知识、跨文化知识 人文社科知识	商务语言知识、国际商务知识、跨文化知识 人文社科知识、跨学科知识
能力	英语语言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商务实践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思辨创新能力、学术研究能力	英语语言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商务实践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思辨创新能力、学术研究能力
素质	热爱祖国, 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家国情怀 具备正确的三观和人文素养 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宽阔的国际视野	具备正确的三观、人文素养与国际视野 敬业爱岗、遵纪守法、团结合作、吃苦耐劳 具备审美能力、应变能力、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识”“能力”和“素质”三个宏观方向制定安排。在“知识”建构方面, 两校都从语言、商务、跨文化及人文社科相关知识对人才应具备的知识体系提出要求, 保证了人才在掌握“英语+商务”知识技能的同时熟悉中外商务国情及文化、了解人文社科等基本知识。此外, B校在此基础上还特别强调了跨学科知识的培养, 不同于传统文科的教学, B校独特的跨学科知识培养转变了传统语言专业人才培养观念、打破了传统语言学科发展界限、创新了语言教学方法模式, 以学科交叉和知识整合的形式对人才给予培养, 对学生的多元互补的知识体系提出一定要求。

在“能力”建构方面, 两校对人才培养的能力要求框架也基本一致, 都从专业知识能力、专业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与研究创新能力的角度出发循序渐进地为人才能力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具体包括: 英语语言能力、商务实践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思辨创新能力及学术研究能力, 重视学生将所掌握的“英语+商务”专业技能应用于实践, 以具备良好的语言及跨文化商务交际与沟通能力。此外, 两校都提出了对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建设和培养, 在知识能力培养的同时, 教会学生如何检索文献、查询资料等, 为学生的研

究能力做好铺垫。

在“素质”建构方面，A、B两校都很注重对学生三观的培养，也强调了对人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教育，如：爱岗敬业、遵纪守法的社会责任感。此外，相较B校，A校还突出对学生家国情怀及开放包容精神的教育，在热爱祖国、政治方向正确的基础上，培养人才的国际视野及正确的价值导向。

2.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

通过对培养方案中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的对比，发现A、B两校结构相差不大，都是从通识公共课、专业课及实践三方面宏观把握（见下页表3）。两校对通识公共课都以“必修”

表3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对比



[下载原表](#)

	A校	B校
通识课 / 公共课	通识必修课	公共必修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	
	通识基础课	
	通识选修课	公共任意选修课
	通识核心课	
	校本特色课	
专业课	专业技能课：商务语言基础、商务英汉 / 汉英翻译等	专业基础课：综合商务英语、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等
	专业知识课：英语国家商务国情、国际贸易学等	专业必修课：商务英语阅读写作、商务翻译等
	培养方向课：英语语言学、商务计划书写作等	专业选修课：财务报表分析、中国文化概要等
实践课 / 毕业论文	实践课：国防教育、专业认知与技能训练、实习等	素质实践：军事体育训练、公益劳动等
		专业实践：短学期实践
	毕业论文	双创实践：社会调查、创新创业 综合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和“选修”作为标准划分；对于专业课，A校将其划分成专业技能课（如商务语言基础、商务翻译等）、专业知识课（如英语国家商务国情、国际贸易学等）及培养方向课（如英语语言学、商务计划书写作等），B校从专业基础课（如综合商务英语、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等）、专业必修课（如商务英语阅读写作、商务翻译等）及专业选修课（如财务报表分析等）三方面构建；而对于实践教学，A校从实践课程和毕业论文两方面设定，B校则从素质实践、专业实践、双创实践及综合实践四方面设定，且毕业论文与毕业实习一同包含在其综合实践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将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作为两校专业课的基础上，两校还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即将西方文化的教学建立于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之上，强调学生在谙熟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英语国家文化、国情的同时，使其在跨文化交际时有更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此外，两校商务英语专业都突出了其专业特色。A校突出其语言教学优势，如建立商务英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结合的复语人才培养；B校更注重对财会、商务等特色课程的教学，如将“财务报表分析”一课加入专业选修课中，将专业知识教学与校际特色结合，开发出更多独具特色的课程，在培养人才专业知识的同时，给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给予足够重视，展现了“一校一品”、避免了“千校一面”、打造“百花齐放春满园”的课程群。

（二）访谈结果对比

教学活动与课外活动是一种并列和互补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现代学校教育的整体结构。我国古代教育巨著《学记》就专门论述了关于“正业”和“居学”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通过“正业”，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学科，通过“居学”，即教学之外的闲暇时间里自主学习弹琴弄瑟、辨识着服之礼等。因而，本研究将从两所高校的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1. 课堂教学

课堂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课堂质量是教学质量高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通过与两所

学校相关负责人和个别老师的交流访谈得知,在两所高校的课堂教学中,“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元素“闪亮登场”的方式,一种就是以某种特定情景的案例而有可能出现在个别专业课教学中,专门开设专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另一种必然出现的情况就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势与政策》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课程教学中有些许涉

表4 相关课程设置对比  [下载原表](#)

A 校	B 校
形势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十章:外交与国际战略 2018年3月、4月新增设共1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专业及课程,如捷克语、菲律宾语,同时,通过“英语+小语种”课程培养复语人才	形势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十章:外交与国际战略

及,但内容量、侧重点及课时都相对有限。不过,对于A校来说,除上述两门课中有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元素,还在特别开设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课程中强调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才培养的结合,而B校受限于院校专业设置,缺少开设小语种课程的条件,只能在其他课程中加大跨文化交流沟通等相关的课程建设(见下页表4)。

2. 第二课堂

与传统课堂教学中“一带一路”相关内容的渗透相比,两校都比较重视在第二课堂教学中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元素,并致力于发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传统课堂教学的意义再大,也存在着“先天不足”,如考试要求和班级规模的限制对学生个性的发展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是学生自由和有选择参与的活动,是学生特长、兴趣和个性能够展现的舞台,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通过访谈,本研究整理了两校在第二课堂教学中包含“一带一路”倡议的课外活动的形式,主要体现在讲座、论坛或交流会、竞赛、活动和其他5个方面。

表5 相关讲座对比  [下载原表](#)

A 校	B 校
组织校内校外专家学者开展“一带一路”相关讲座,如2019年10月8日举办的“‘一带一路’的区域研究与民族关系”讲座;2019年10月28日举办的“‘一带一路’传播的意义”等讲座	无

表6 相关论坛、交流会对比  [下载原表](#)

A 校	B 校
主办或承办各类学术交流会及论坛,并鼓励学生以多种方式参与其中,如: 2017年9月28日组织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并服务“丝绸之路教育合作交流会”; 组织学生旁听2017年6月6日承办的“丝路区域合作与发展”; 2017年5月15日各二级学院组织学生观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学习集思广益、各抒己见等	组织学生党员学习的《党政工作要点》(其中包含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学习与研究) 承办相关论坛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旁听,如:2019年4月26日“首都经济专家论坛”; “2018丝绸之路经济国际论坛”等

关于讲座,A校更多地举办了相关主题讲座,如2019年10月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组织开展的《“一带一路”传播的意义》、国际关系学院老师开办的《“一带一路”的区域研究与民族关系》等;相比之下,B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鲜有与“一带一路”相关主题的讲座,而究其原因,是由于B校商务英语专业起

步较晚、尚处于摸索阶段，因而在人才培养途径的经验略显不足，导致对主题讲座的重视度不足（见表5）。

再者，两校也都以不同形式鼓励学生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论坛或主题交流会（见表6）。A校形式丰富、数量可观，如2017年5月各二级学院组织学生观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以圆桌会议的形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学习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同年9月，组织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并服务“丝绸之路教育合作交流会”；也在2017年6月组织学生旁听“丝路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等，相比之下，B校受专业的取向限制，外事交流论坛或会议方面资源不足、机会较少，导致论坛、会议的形式数量远不及A校；此外，正如前文提到，B校商务英语专业起步晚、经验少是其论坛、交流会数量少、形式单一的原因之一。

在相关竞赛方面，如表7所示，A校借助其庞大的留学生群体，积极开展了包括创业大赛、辩论赛在内的多项促进国际学生交流的比赛，促使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相互学习，如2016年6月，A校举办的“丝绸之路”杯中美大学生辩论赛、2019年10月举办的“一带一路”留学生创业大赛，同时，鼓励海内外学生于每年12月定期参加“丝绸之路”国际定向越野赛等；此外，A校也针对校内的学生开展“党团知识竞赛”等活动，在竞赛的紧张而又愉快氛围中加深国内外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而通过对B校的教研室主任访谈得知，B校只在研究生范围内开展过“一带一路”创新科研实践成果大赛，对其他群体却鲜有相关竞赛的设计涉及，因此，B校可从其他学校汲取在举办竞赛活动方面的经验，借助多样的竞赛方式，加强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

表7 相关竞赛对比  [下载原表](#)

A校	B校
每年12月“丝绸之路”国际定向越野赛；	
2016年6月“丝绸之路”杯中美大学生辩论赛；	研究生“一带一路”创新科研实践成果大赛
2019年10月“一带一路”留学生创业大赛；	
2017年11月“党团知识竞赛”等	

表8 课外活动及其他方面对比  [下载原表](#)

A校	B校
2019年1月，二级学院与当地“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中心为学生建设校外实习基地；	一年一度的“‘一带一路’青年读书会”；
2017年5月，“一带美食，一路风情”中外文化艺术节；	2017“丝绸之路”图书展
2016年，全国大学生“一带一路”暑期社会实践	2019年10月组织外教开展“俄语免费培训班”及“英语角”
“丝绸之路”语言协同服务创新中心	图书馆专栏《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一带一路”大数据研究中心

知。

在课外活动方面，A、B两校都依据各自的特色资源，开设了不同形式的课外活动（见表8）。A校利用其留学生资源，开展了许多国际交流活动，如2017年5月举办的“一带美食，一路风情”中外文化艺术节；而B校则开展了许多相关的图书会、图书展、相关语种培训课等，并在图书馆开设了相关主题的数据库专栏；同时两校也都从宏观角度，建立了不同的校级人才培养机构，如A校的“丝绸之路”语言协同服务创新中心，面向“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及学校教学科研实际，发挥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方面的综合职能；B校的“一带一路”大数据研究中心面向的群体主要是包含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在内的教师群体，通过开展设立“一带一路”相关科研项目研究，强化教师

团队的建设,提升师资水平。

传统课堂教学是传授知识和理念的经典途径,有利于学科知识的系统传授和学生基本功的扎实掌握,然而,“一种好的教育不是把教育的重心过多地停留在对知识点周而复始的巩固上,而是放在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上。学生只有通过知识的应用过程,才能不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扩展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进而形成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完成任务、走向超越的能力”。对于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来说,增加第二课堂的教学比重不仅能帮助学生丰富语言及人文百科知识,强化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技能,更能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开阔视野,提高英语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上述两校将第二课堂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相融合,充分体现了对传统英语教学改革成效,反映了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尊重。

(三) 建议

通过对以上两所地方高校的对比研究,以提高“一带一路”倡议在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的融入度为目标,笔者认为,不论是以外语类为专业特色的院校还是商贸类为专业特色的院校,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加强各种平台建设,推动教学管理等各方面的改革。

A校从管理的视角需要重视教师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研究。可以通过搭建各种学术平台,以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教师结合自身专业知识结构、参与关于“一带一路”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从而提升师资水平及跨文化教学能力、提高知识的传播质量。

B校需进一步丰富第二课堂教学的内容与形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通过发展校际合作,引进一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组织与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也可根据本校特色,开展经贸、财经主题的研讨会、讲座、课外活动等,科学设置第二课堂体系与功能,切实增强第二课堂的教育功能,给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提供学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文化交流、经商机会,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四、构建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再思考

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侧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和提升,同时,服务社会尤其是服务“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更需要文化和信念作为学生人格的支撑、需要家国情怀,将个人与民族的命运相结合,需要心系天下、胸怀南北,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所有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要在奋斗精神上下功夫”。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对广大青年的六点殷殷希望同样是面向所有专业的“强国一代”。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必须注重引导学生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加强世情国情的研修,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和向心力,教育他们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各种诱惑时,经得起考验,“要怎样爱国”,如何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谋福祉的时代使命中,“亮出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一) 专业知识是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必备的基本功

基于“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不论是以外语为专业特色还是商贸为专业特色,不论是传统课堂教学还是第二课堂建设,首先都必须紧紧围绕着掌握基本的商务知识和语言工具开展教学设计,这是商英人才培养的基本构成。按照《国标》中明确提出的“较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一人才培养要求,商务英语专业知识培养需兼顾“英语+商务”两大宏观领域。同时,潘慧霞教授指出“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并不是简单的‘商务+英语=商务英语’,而是一种观念上的综合、知识系列的融合,其结果应是‘1+1>2’”。不论是语言知识培养还是商务知识培养,两者的课程群都是相互且纵横关联的,高校可通过建

立以专业性商务知识与英语语言为主要内容的课程群,如经贸翻译、法律语言研究等,综合培养具备综合专业知识的人才。此外,高校的人才培养还可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域特色或校际特色等,利用自主权对课程的设置进行适当调整。如:地处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地方高校,可结合其历史价值将“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知识(如沿线国家国情、语言等)融合进商务英语的培养体系之中。

(二)能力是知识的体现

Ellis&Johnson认为商务英语专业一要教会学生国际商务中使用的英语,即商务英语;二要教会学生用英语去从事国际商务,即英语商务。“一带一路”发展倡议需要的是懂英语的商务复合型建设人才,“建设”二字养成于学生的课内外学习过程,体现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术研究能力、思辨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运用能力。因此,基于人才培养体系的思考,就是要通过课堂知识的传授和课外各种活动的开展,激发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明确自我发展方向,鼓励学生参与相关学术研讨会和专家讲座,自觉发掘最新研究动态或新型商业形势,推进引进国外教材与我国自编的教材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合理分析及批判性的吸收,创造机会让学生参加商务实践性质的比赛或在涉外类企事业单位或跨国公司 etc 地方实习等,以提升语言技能和商务实践技能相结合的综合性能力。

(三)国际视野和人文情怀是参与“一带一路”的必备素养

上述分析中两所地方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都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思政、通识课拓展“一带一路”相关知识的传授,但是主动有效地利用这一途径和被动遵循方案开设这些课程所带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新时代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拓展与沿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意,也是东方崛起大国与西方守成大国之间诸领域博弈与较量的战略重地。“一带一路”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注定要站在博弈大国与合作共赢的前沿阵地,他们也是在参与全球治理中争取中国在各领域话语权的主力军。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意义重大。因此,对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必须要加强思政与通识课的课堂知识与拓展,紧紧把握各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深度剖析国家商务部、外交部和国务院乃至中央制定出的各项决策和发展战略及其背景,站在国家战略高度放眼世界,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运用国际通用语言,牵线所有国家,立足所学专业,立己达人、兼济天下。国际商贸是国家关系的风向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模式”的保障,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石,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过程中不仅是商务往来,更需要通过业务的往来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以个人所代表的国家形象有力回击对中国的“唱衰”,维护国家的尊严和独立。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并推动经济政治的进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容并蓄”中发展至今,已不仅仅是中华民族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与信仰,更是社会经济进步不可替代的需要,其始终是文化自信的最强引擎。对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因其跨专业学科的复杂性,他们很容易处于一个多种思想观念交汇融合的地位。作为“强国一代”,他们固然需要了解学习西方文化,但是他们更需要“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语言内容或专业素养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用文化自信书写中国智慧,用中国智慧推动全球治理。

4、“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来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1年3月第28卷第2期)

【作者】廖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尚宇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一带一路”国家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支撑作用增强。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起一套指标体系,测算出“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分析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除进行总量分析外,本文还分别从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用途结构和二元边际结构等方面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进行分类,详细分析了贸易便利化对各类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提升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极大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流量的提升,并优化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其中以口岸与物流效率和海关与边境管理对中国出口影响最大。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促进作用显著,表明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 贸易便利化; 引力模型; 要素结构; 技术结构

【正文】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迅速在全球蔓延,各国不同程度地采取停工停产、封锁边境等措施遏制病毒传播,导致商品、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阻。近几年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倾向,使得各国对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更加谨慎,基于全球分工的生产体系和贸易格局面临重构。如何减少和消除国际贸易投资流程中的技术和机制性障碍,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贸易投资环境,提高相关国家的贸易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水平成为越来越多渴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国家和区域性组织所关注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以来,迄今已逾七载,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该倡议致力于构建一个以沿线国家为基础的多边、多区域的开放合作平台,从而加快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早期成果开始显现,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贸易合作均取得重大进展。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与格鲁吉亚、马尔代夫、韩国、东盟、新加坡等国签署或升级了原有自贸协定,与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逐步形成。贸易合作上,2013~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6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欧美国家疫情急剧恶化,受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前两个季度中国对亚洲的贸易比重上升,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均有所下降,其中对美国的出口额下降幅度最大,“一带一路”国家的支撑作用凸显。在此背景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评估,并分析其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及结构的影响十分必要,以便进一步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并为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政策建议。

对于贸易便利化的测度和效应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主要通过层次分析法(曾铮和周茜,2008)、算术平均法(Wilson等,2003;谭晶荣和潘华曦,2016)和主成分分析法(孔庆峰和董虹蔚,2015)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贸易便利化水平。算术平均法将所有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没有考虑到不同指标的异质性影响,而层次分析法则依赖于专家的主观判断,对不同指标进行赋值,受主观性影响较大。相比较而言,主成分分析法通过因子分析提炼出主要成分,能够克服既往研究对指标权重赋值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此,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

此外,既有文献对实证模型的选取主要有两种,即拓展引力模型和GTAP模型。众多学者围绕贸易便利化对进出口贸易、贸易潜力以及经济福利等方面展开研究:如罗翊烜和扈钟方(2017)及吴兆丹等(2020)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认为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陈继勇和刘焱爽(2018)基于引力模型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的影响；刘宇等(2016)运用 GTAP 模型分别测算了中哈两国关税削减和贸易便利性提升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关税削减；韩星(2019)运用 GTAP 模型测算了贸易时间成本降低 30%的基础上，贸易便利化提升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少数学者考察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多样性或二元边际的影响，如 Shepherd(2011)、Lee 和 Kim(2012)、涂远芬(2020)等。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均围绕贸易便利化对出口总量的影响进行研究，鲜有学者从贸易结构视角系统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在指标的选取上，有的学者仅以出口所需物流天数或成本来衡量贸易便利化，有失偏颇。因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 50 个国家¹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拓展引力模型分析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各指标对中国出口流量的影响，并着重从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用途结构以及二元边际结构等角度，详细考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以期得出更有针对性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

(一)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由于贸易便利化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且国际对其没有公认的标准定义，本文参考 Wilson 等(2003)的研究方法，根据货物贸易跨越国境时所需要经过的各项环节，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重点，将“口岸与物流效率”“海关与边境管理”“金融与电子商务”“政府与规制环境”等设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此外，各一级指标下分别设立了更为细分的二级指标(具体见表 1)，基本涵盖了贸易便利化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所有数据均来自《全球竞争力报告》(GCR)、《全球贸易促进报告》(GETR)，由于 GETR 只有偶数年数据，在测算奇数年的数据时采用相邻两个偶数年的平均值。正指标表明，得分越高越有利于出口贸易的进行，逆指标则相反。

表1 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成



下载原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范围	来源	属性
口岸与物流效率 I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 $I_1(0.1787)$	1-7	GCR	正指标
	航空基础设施质量 $I_2(0.166)$	1-7	GCR	正指标
	装运负担能力 $I_3(0.1914)$	1-5	GETR	正指标
	物流竞争力 $I_4(0.2017)$	1-5	GETR	正指标
	运输及时性 $I_5(0.2067)$	1-5	GETR	正指标
海关与边境管理 C	海关程序负担 $C_1(0.2138)$	1-7	GCR	正指标
	海关清关效率 $C_2(0.2179)$	1-5	GETR	正指标
	进出口中的额外支付 $C_3(0.2201)$	1-7	GETR	正指标
	贸易关税 $C_4(0.1848)$	1-7	GCR	逆指标
	贸易壁垒程度 $C_5(0.2143)$	1-7	GCR	正指标
金融与电子商务 F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F_1(0.1745)$	1-7	GCR	正指标
	金融服务的可负担性 $F_2(0.1645)$	1-7	GCR	正指标
	互联网使用人数 $F_3(0.2212)$	1-100	GCR	正指标
	最新技术的可得性 $F_4(0.2178)$	1-7	GCR	正指标
政府与规制环境 E	争端解决效率 $E_1(0.1072)$	1-7	GCR	正指标
	政府制定政策的透明度 $E_2(0.157)$	1-7	GCR	正指标
	政府规制负担 $E_3(0.0779)$	1-7	GCR	正指标
	法律效率 $E_4(0.1091)$	1-7	GCR	正指标

(二)

数据处理与权重确定
首先，为了消除因各基础指标自身变异大小、取值范围和量纲的不同而带来的影响，本文使用线性变换法对各二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得标准化后的规范值的取值范围均在 0~1 之

间。然后，本文使用 stata 软件先对上述规范值进行 KMO 检验，随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反映大部分信息的主成分及其贡献率。最终根据数据变异程度观察、特征值分析，提取前 3 个主成分(Comp1、Comp2、Comp3)，信息提取比为 85.42%，因此也说明了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确定权重的合理性。以下分别是所提取前3个主成分的表达式:

$$\begin{aligned} \text{Comp}_1 = & 0.2479I_1 + 0.2466I_2 + 0.2307I_3 + 0.2436I_4 + 0.2289I_5 + 0.2611C_1 + \\ & 0.2609C_2 + 0.2534C_3 + 0.1204C_4 + 0.2522C_5 + 0.2573F_1 + 0.2586F_2 + 0.1991F_3 + \\ & 0.2623F_4 + 0.2272E_1 + 0.2374E_2 + 0.1805E_3 + 0.2285E_4 \end{aligned} \quad (1)$$

$$\begin{aligned} \text{Comp}_2 = & -0.0002I_1 - 0.088I_2 + 0.2631I_3 + 0.2436I_4 + 0.3108I_5 - 0.0153C_1 + \\ & 0.2098C_2 + 0.015C_3 + 0.3334C_4 + 0.0165C_5 - 0.0316F_1 - 0.124F_2 + 0.2635F_3 + \\ & 0.0899F_4 - 0.3609E_1 - 0.2584E_2 - 0.4392E_3 - 0.3569E_4 \end{aligned} \quad (2)$$

$$\begin{aligned} \text{Comp}_3 = & -0.1196I_1 - 0.0906I_2 - 0.3211I_3 - 0.2578I_4 - 0.2084I_5 + 0.222C_1 - \\ & 0.1705C_2 + 0.3118C_3 + 0.4979C_4 + 0.2486C_5 - 0.1977F_1 - 0.1509F_2 + 0.3457F_3 + \\ & 0.0516F_4 - 0.0974E_1 + 0.2215E_2 + 0.1348E_3 - 0.0936E_4 \end{aligned} \quad (3)$$

根据上述表达式,再结合各主成分的贡献率,计算可得贸易便利化的综合评价模型。表达式如下:

$$\begin{aligned} \text{Comp} = & 0.1787I_1 + 0.166I_2 + 0.1914I_3 + 0.2017I_4 + 0.2067I_5 + 0.2138C_1 + \\ & 0.2179C_2 + 0.2201C_3 + 0.1848C_4 + 0.2143C_5 + 0.1745F_1 + 0.1645F_2 + 0.2212F_3 + \\ & 0.2178F_4 + 0.1072E_1 + 0.157E_2 + 0.0779E_3 + 0.1091E_4 \end{aligned} \quad (4)$$

上述综合评价模型中的系数为其相应二级指标的权重,通过将其相加可得一级指标权重(详见表1)。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数(TF)则由一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乘以其权重,相加

表2 2011~2018年亚洲及非洲各国贸易便利化测度均值及排名  [下载](#)

		物流效率		边境管理		金融与电子商务		政府与规制环境		贸易便利化		
		I	排名	C	排名	F	排名	IS	排名	TF	排名	便利度
东亚和东南亚	新加坡	0.868	1	0.886	1	0.837	1	0.894	1	0.870	1	非常便利
	马来西亚	0.733	4	0.703	11	0.773	7	0.712	5	0.731	6	比较便利
	泰国	0.671	10	0.595	26	0.638	24	0.544	24	0.617	20	一般便利
	印尼	0.596	24	0.588	28	0.603	28	0.556	21	0.588	26	一般便利
	菲律宾	0.550	33	0.558	35	0.643	22	0.473	37	0.563	33	一般便利
	越南	0.586	26	0.538	38	0.558	38	0.488	33	0.546	36	不便利
	柬埔寨	0.532	38	0.506	44	0.524	43	0.463	39	0.510	44	不便利
南亚	蒙古	0.428	47	0.545	37	0.508	45	0.490	32	0.495	45	不便利
	印度	0.638	17	0.574	30	0.579	36	0.575	15	0.592	25	一般便利
	斯里兰卡	0.577	28	0.525	40	0.601	29	0.559	19	0.565	32	一般便利
	巴基斯坦	0.569	30	0.499	45	0.524	42	0.465	38	0.518	42	不便利
	孟加拉国	0.524	41	0.490	47	0.498	47	0.423	48	0.489	46	不便利
	尼泊尔	0.411	49	0.459	48	0.489	48	0.451	41	0.453	49	不便利
	哈萨克斯坦	0.528	40	0.588	27	0.613	26	0.572	16	0.576	29	一般便利
中亚	塔吉克斯坦	0.426	48	0.564	32	0.517	44	0.585	13	0.518	41	不便利
	吉尔吉斯斯坦	0.396	50	0.497	46	0.472	49	0.439	45	0.453	48	不便利
西亚和北非	阿联酋	0.804	2	0.816	2	0.830	3	0.798	3	0.813	2	非常便利
	卡塔尔	0.734	3	0.770	3	0.834	2	0.811	2	0.785	3	非常便利
	巴林	0.676	8	0.739	5	0.812	4	0.717	4	0.738	4	比较便利
	以色列	0.687	6	0.715	8	0.785	5	0.654	9	0.715	7	比较便利
	沙特阿拉伯	0.663	12	0.694	13	0.725	11	0.692	8	0.694	8	比较便利
	阿曼	0.641	16	0.706	9	0.707	13	0.696	7	0.688	9	比较便利
	土耳其	0.688	5	0.616	23	0.670	18	0.567	18	0.640	15	一般便利
	约旦	0.611	21	0.624	21	0.671	17	0.620	11	0.632	16	一般便利
	科威特	0.583	27	0.608	24	0.691	14	0.550	22	0.613	21	一般便利
	埃及	0.621	19	0.518	42	0.546	41	0.515	28	0.552	34	一般便利
	黎巴嫩	0.549	34	0.527	39	0.649	21	0.421	49	0.545	37	不便利
	伊朗	0.511	42	0.438	50	0.500	46	0.499	30	0.485	47	不便利
	也门	0.451	46	0.454	49	0.402	50	0.365	50	0.423	50	不便利

求和得到。

（三）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与分析

本文计算了“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指标，并标准化为0~1。依据学者的一般划分，本文将贸易便利化水平在0.8分以上的国家，划分为非常便利的国家，0.7~0.8分为比较便利，0.6~0.7分为一般便利，0.6分以下为不便利（具体结果见表2和表3）。

注：作者根据表1来源数据计算所得，其中便利度是由各国综合便利化指标TF四舍五入后得到。

从表2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东南亚和西亚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南亚和中亚的贸易便利化程度较低，其中新加坡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最高，各项指标均名列第一。中亚国家受所处地理位置影响，不靠海不沿江，高山环绕，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物流效率较低。南亚国家除

表3 2011~2018年欧洲各国贸易便利化测度均值及排名



[下载原图](#)

		物流效率		边境管理		金融与电子商务		政府与规制环境		贸易便利化		
		I	排名	C	排名	F	排名	IS	排名	TF	排名	便利度
中东欧国家	爱沙尼亚	0.666	11	0.767	4	0.775	6	0.707	6	0.732	5	比较便利
	捷克	0.686	7	0.703	10	0.737	8	0.513	29	0.672	10	比较便利
	立陶宛	0.656	13	0.689	15	0.727	10	0.580	14	0.670	11	比较便利
	斯洛文尼亚	0.649	15	0.723	7	0.679	15	0.549	23	0.660	12	比较便利
	拉脱维亚	0.671	9	0.684	16	0.709	12	0.533	25	0.659	13	比较便利
	波兰	0.655	14	0.699	12	0.662	19	0.533	26	0.647	14	一般便利
	匈牙利	0.619	20	0.689	14	0.678	16	0.496	31	0.632	17	一般便利
	斯洛伐克	0.591	25	0.677	17	0.734	9	0.442	44	0.626	18	一般便利
	克罗地亚	0.604	23	0.656	18	0.643	23	0.439	46	0.599	22	一般便利
	马其顿	0.534	37	0.631	20	0.630	25	0.588	12	0.598	23	一般便利
	希腊	0.629	18	0.651	19	0.608	27	0.450	42	0.597	24	一般便利
	保加利亚	0.607	22	0.603	25	0.600	30	0.477	36	0.580	28	一般便利
	罗马尼亚	0.570	29	0.623	22	0.580	35	0.483	35	0.572	30	一般便利
	阿尔巴尼亚	0.561	31	0.582	29	0.590	33	0.532	27	0.570	31	一般便利
其他欧洲国家	波黑	0.460	45	0.569	31	0.596	31	0.461	40	0.528	39	不便利
	格鲁吉亚	0.529	39	0.732	6	0.564	37	0.652	10	0.620	19	一般便利
	阿塞拜疆	0.552	32	0.549	36	0.655	20	0.572	17	0.582	27	一般便利
	亚美尼亚	0.499	43	0.559	34	0.585	34	0.558	20	0.550	35	一般便利
	俄罗斯	0.547	36	0.518	43	0.594	32	0.485	34	0.539	38	不便利
	摩尔多瓦	0.475	44	0.560	33	0.556	39	0.446	43	0.516	43	不便利
	乌克兰	0.547	35	0.523	41	0.549	40	0.428	47	0.519	40	不便利

印度和斯里兰卡外，各项指标得分都较低，排名靠后。

注：作者根据表1来源数据计算所得，其中便利度是由各国综合便利化指标TF四舍五入后得到。

从表3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各国中贸易便利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主要位于中东欧地区，其中爱沙尼亚的得分最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排在所有样本国的第五位。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普遍较高，且其贸易便利化程度较为平衡，主要在政府与制度环境这一指标上得分较低，表明我国企业在与当地企业做贸易的时候，要特别关注其制度和法律环境，善于与政府官员打交道。

从总体上看，亚洲地区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异性较大，既有最为便利的新加坡

和阿联酋,也有最不便利的尼泊尔和也门。欧洲地区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则总体较为均衡,多处于比较便利和一般便利水平。从变化趋势上看,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印度、克罗地亚、马其顿、阿塞拜疆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较快。除沙特阿拉伯和阿曼这两个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略有下降外,其余国家均呈现曲线上升的趋势。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经典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贸易便利化水平,虚拟变量SCO、OECD和ASEAN,构建了拓展引力模型:

$$\ln EXP_{ijt} = \beta_0 + \beta_1 \ln GDP_{jt} + \beta_2 \ln POP_{jt} + \beta_3 \ln Dist_{ijt} + \beta_4 \ln TF_{jt} + \beta_5 SCO_{jt} + \beta_6 OECD_{jt} + \beta_7 ASEAN_{jt} + \varepsilon_{ijt} \quad (5)$$

其中: EXP_{ijt} 表示 t 年中国对 j 国的出口,出口数据来自 UNcomtrade 数据库; GDP_{jt} 表示 t 年 j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均以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衡量; POP_{jt} 、 $Dist_{ijt}$ 和 TF_{jt} 分别表示沿线国的人口、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和该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SCO_{jt} 、 $OECD_{jt}$ 和 $ASEAN_{jt}$ 均为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在样本年份中沿线国是否属于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东盟成员,是则取值为 1,否则取 0; ε_{ijt} 表示 t 年中国与 j 国中与出口有关的随机扰动项。各变量的预期符号、理论依据及数据来源见下表 4。

表4 解释变量的预期符号、理论依据和数据来源

 [下载原表](#)

解释变量	预期符号	理论依据	数据来源
GDP_{jt}	正	一国的经济总量反映其潜在的贸易需求,贸易需求越大,出口越大	世界银行数据库 (单位:美元)
POP_{jt}	不确定	人口越多消费需求越大,但同时可能会因国内分工深化减少国际贸易	世界银行数据库 (单位:人)
$Dist_{ijt}$	负	两国距离越远,贸易成本越高	CEPII数据库 (单位:千米)
TF_{jt}	正	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	前文计算所得
SCO_{jt}	正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通过区域内的优惠贸易协定促进贸易	SCO官方网站
$OECD_{jt}$	正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通过区域内的优惠贸易协定促进贸易	OECD官方网站
$ASEAN_{jt}$	正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通过区域内的优惠贸易协定促进贸易	ASEAN官方网站

(二)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 总量分析

首先,采用对变量取自然对数,并选择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方法来控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其次,针对回归模型的选取,本文先后运用 LSDV 法和 Hausman 检验分别排除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并最终选择混合 OLS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将贸易便利化加入传统引力模型后,再依次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引力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各变量符号均符合预期,且非常显著。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能显著促进中国对其出口。加入 3 个区域性组织的虚拟变量后,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显著性和系数有所下降,但仍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上海合作组织(SCO)、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和东盟(ASEAN)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其中上海经济合作组织的促进作用最

大, 其系数为 0.977, 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系数则为 2.184, 表明相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更大。

表5 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标回归结果


[下载原表](#)

VARIABLES	(1)	(2)	(3)	(4)
$\ln GDP_{jt}$	0.611*** (0.133)	0.577*** (0.130)	0.524*** (0.135)	0.541*** (0.133)
$\ln POP_{jt}$	0.335*** (0.150)	0.366*** (0.138)	0.411*** (0.144)	0.346** (0.134)
$\ln Dist_{ijt}$	-1.409*** (0.308)	-1.280*** (0.248)	-1.355*** (0.265)	-1.125*** (0.263)
$\ln TF_{jt}$	2.299*** (1.115)	2.832*** (1.047)	2.926*** (1.113)	2.184* (1.210)
SCO_{jt}		0.833* (0.429)	0.856*** (0.413)	0.977*** (0.387)
$OECD_{jt}$			0.373* (0.191)	0.453** (0.192)
$ASEAN_{jt}$				0.719** (0.340)
Constant	14.46*** (3.089)	13.89*** (2.598)	15.11*** (2.765)	13.28*** (2.687)
Observations	399	399	399	399
R-squared	0.807	0.824	0.830	0.842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表6 贸易便利化分指标回归结果


[下载原表](#)

VARIABLES	(5)	(6)	(7)	(8)
$\ln GDP_{jt}$	0.404*** (0.131)	0.586*** (0.124)	0.612*** (0.135)	0.656*** (0.119)
$\ln POP_{jt}$	0.383*** (0.111)	0.344*** (0.132)	0.280*** (0.128)	0.233*** (0.1000)
$\ln Dist_{ijt}$	-1.218*** (0.231)	-1.114*** (0.268)	-1.119*** (0.270)	-1.056*** (0.261)
SCO_{jt}	1.207*** (0.383)	0.932*** (0.380)	0.938*** (0.387)	0.884** (0.387)
$OECD_{jt}$	0.437*** (0.184)	0.356*** (0.195)	0.448*** (0.198)	0.571*** (0.193)
$ASEAN_{jt}$	0.548*** (0.268)	0.718*** (0.323)	0.806*** (0.346)	0.859*** (0.295)
INF_{jt}	5.670*** (1.599)			
CUS_{jt}		3.292* (1.644)		
FIN_{jt}			2.200 (1.598)	
INS_{jt}				1.611 (0.981)
Constant	12.44*** (1.830)	8.946*** (2.206)	9.970*** (2.125)	9.602*** (2.189)
Observations	399	399	399	399
R-squared	0.864	0.844	0.837	0.839

为进一步评估贸易便利化各项分指标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及其影响程度, 本文将贸易便利

化的4个一级指标加入模型(5)中进行回归分析。其中, INF代表“口岸与物流效率”、CUS代表“海关与边境管理”、FIN代表“金融与电子商务”、INS代表“政府与规制环境”。同样采用混合OLS回归, 结果如表6所示。

在贸易便利化的各项一级指标中, 口岸与物流效率(INF)的影响力最大, 系数为5.67, 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海关与边境管理(CUS)也在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而金融与电子商务(FIN)和政府与规制环境(INS)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其系数与预期符号一致。表明当前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 应重点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 促进双边海关与边境管理的合作, 提高物流清关效率和透明度。

2. 结构分析

(1) 不同要素结构

表7 要素密集度差异产品的回归结果  [下载原表](#)

VARIABLES	(9)	(10)	(11)
	RES	LAB	CAP
$\ln GDP_{jt}$	0.00617 (0.0849)	0.418*** (0.148)	0.552*** (0.107)
$\ln POP_{jt}$	0.0760 (0.0940)	0.371** (0.161)	0.367*** (0.101)
$\ln Dist_{ijt}$	-0.606*** (0.0945)	-0.951*** (0.311)	-0.846*** (0.225)
$\ln TF_{jt}$	0.201 (0.774)	2.296* (1.360)	2.600** (0.979)
SCO_{jt}	-0.313* (0.167)	1.173*** (0.405)	0.597*** (0.212)
$OECD_{jt}$	-0.0702 (0.163)	0.175 (0.226)	0.522** (0.201)
$ASEAN_{jt}$	0.527*** (0.151)	0.613 (0.379)	0.830*** (0.298)
Constant	29.00*** (1.588)	13.92*** (3.079)	9.674*** (2.329)
Observations	399	399	399
R-squared	0.029	0.745	0.881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可将商品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初级产品, 包括SITC0~SITC4类产品; 第二类为工业制成品, 包括SITC5~SITC8类产品; 第三类为未分类的其他商品, 包括SITC9类产品。通常将初级产品定义为资源密集型产品, 将工业制成品中的第6类和第8类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SITC5、SITC7及未分类的其他产品SITC9定义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为进一步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本文借鉴上述两种分类方法, 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按照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进行分类, 并考察其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

从表7可以看出, 贸易便利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1%, 贸易成本的降低会使得中国对沿线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分别增加2.296%和2.600%。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主要对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产生显著为正的促进作用, 而对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促进作用则不显著, 其中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促进作用最大。

(2) 不同技术结构

根据Lal(2000)分类方式, 在OECD分类的基础上, 首先将SITC(rev. 2)的所有产品归为初级产品(PP)和制成品, 再把制成品分为资源性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和高技术产品(HT)四大类, 最后在上述五大类别的基础上, 再细分到各类产品, 形成十大分类(具体见表8)。

资料来源: Lal (2000)

本文在 Lal1 (2000) 分类的基础上, 将初级产品 (PP) 和资源性产品 (RB) 都归类为低技术产品 (LT), 从而将

表8 Lal贸易品技术分类标准

 [下载原表](#)

分类	含义	具体内容
PP	初级产品	鱼类、肉类、大米、煤炭等未经加工的初级产品
RB1	农林加工产品	木制品、饮料等农林粗加工制品
RB2	其他资源性产品	石化产品、水泥、玻璃灯
LT1	纺织服装产品	皮革、鞋、帽、纺织品等
LT2	其他低技术制成品	家具、玩具、塑料产品等
MT1	汽车工业产品	汽车及配件、摩托车及配件等
MT2	中技术加工制成品	化工制品、钢、肥料
MT3	工程机械产品	钟表、引擎、制造业机器设备、家电产品等
HT1	电子设备产品	办公自动设备、电脑、发电机等
HT2	其他高技术产品	航天航空设备、卫星、精密仪器等

SITC (rev. 2) 的所有产品分为低技术产品 (LT)、中技术产品 (MT) 和高技术产品 (HT)。三大类, 进而分别将中国对沿线国

家在上述三类产品方面的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到模型中, 分别分析贸易便利化对技术含量不同的产品出口的影响 (具体见表 9)。

表 9 显示, 从商品的技术结构来看, 贸易便利化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系数也最大, 为 2.680, 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升 1%, 将促使中国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增加 2.68%。对中技术和低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也均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通过与其他变量系数进行对比, 发现贸易便利化的回归系数相对较大, 说明在中国对沿线国家技术含量不同的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中, 贸易便利化的影响作用更为重要。

(3) 经济用途结构

表9 技术结构差异产品的回归结果

 [下载原表](#)

VARIABLES	(12)	(13)	(14)
	HT	MT	LT
$\ln GDP_{jt}$	0.480*** (0.100)	0.588*** (0.126)	0.473*** (0.144)
$\ln POP_{jt}$	0.412*** (0.0953)	0.288** (0.120)	0.320** (0.150)
$\ln Dist_{jt}$	-0.642*** (0.201)	-0.926*** (0.256)	-1.041*** (0.303)
$\ln TF_{jt}$	2.680*** (0.952)	2.034* (1.113)	2.251* (1.319)
SCO_{jt}	0.461** (0.213)	0.767** (0.290)	1.105*** (0.409)
$OECD_{jt}$	1.027*** (0.291)	0.0105 (0.168)	-0.148 (0.250)
$ASEAN_{jt}$	1.263*** (0.361)	0.713** (0.281)	0.700* (0.349)
Constant	7.893*** (2.278)	10.13*** (2.723)	14.13*** (3.008)
Observations	399	399	399
R-squared	0.808	0.833	0.736

按照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 (SNA) 中的基本货物类别分类, 将出口商品分为资本货物、中间货物和消费品三类, 进一步考察贸易便利化对不同经济用途结构产品的异质性影响, 结果如表 10 所示。可见,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中间

品和资本品的出口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其中对中间品的出口促进作用最大, 对消费品的出口影响不显著。

(4) 二元边际结构

借鉴 Fontagne 等 (2016) 做法, 本文采用中国出口到沿线国家的产品种类代表扩展边际, 中国出口到沿线国家的产品平均出口额代表集约边际, 实证考察出口产品目的地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结构的影响, 结果如表 11 所示。从表 11 可以看出,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扩大现有产品的出口额 (集约边际) 以及增加产品出口种类 (扩展边际) 来增加出口, 并且对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大。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表10 不同经济用途结构产品的回归结果

 [下载原表](#)

VARIABLES	(15)	(16)	(17)
	消费品	中间品	资本品
$\ln GDP_{jt}$	0.604*** (0.152)	0.493*** (0.155)	0.672*** (0.102)
$\ln POP_{jt}$	0.173 (0.165)	0.451*** (0.149)	0.257** (0.108)
$\ln Dist_{jt}$	-0.934*** (0.339)	-1.181*** (0.301)	-1.066*** (0.189)
$\ln TF_{jt}$	1.357 (1.540)	2.855** (1.244)	1.955* (1.012)
SCO_{jt}	1.602*** (0.453)	0.699* (0.397)	0.562*** (0.204)
$OECD_{jt}$	0.260 (0.269)	0.384* (0.217)	0.681*** (0.224)
$ASEAN_{jt}$	0.784* (0.406)	0.674* (0.338)	0.760** (0.330)
Constant	11.06*** (3.137)	12.82*** (3.241)	9.245*** (2.178)
Observations	399	399	399
R-squared	0.852	0.812	0.879

关边境管理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为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深入合作，进一步改善贸易便利化指明了方向。

表11 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回归结果

 [下载原表](#)

VARIABLES	总额	(19) 扩展边际	(20) 集约边际
$\ln GDP_{jt}$	0.541*** (0.133)	0.133*** (0.039)	0.384*** (0.135)
$\ln POP_{jt}$	0.346** (0.134)	0.046 (0.042)	0.314*** (0.115)
$\ln Dist_{jt}$	-1.125*** (0.263)	-0.234*** (0.076)	-0.876*** (0.231)
$\ln TF_{jt}$	2.184* (1.210)	0.467* (0.312)	2.066** (0.990)
SCO_{jt}	0.977** (0.387)	0.077 (0.069)	0.997** (0.487)
$OECD_{jt}$	0.453** (0.192)	0.073 (0.055)	0.377** (0.172)
$ASEAN_{jt}$	0.719** (0.340)	0.112 (0.074)	0.613** (0.281)
Constant	13.28*** (2.687)	5.870*** (0.657)	7.830*** (2.676)
Observations	372	372	372
R-squared	0.842	0.730	0.839

进“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着力推进物流和基础设施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贸易便利化水平不高的现状，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如中亚地处内陆，交通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而陆港作为重要的物流建设，是内陆地区直通世界各国港口的物流枢纽。可以通过陆港建设，顺畅“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贸易。

2. 借鉴他国经验，提升海关透明度和通关效率。

与传统的口岸清关模式相比，中国近年来实施的通关一体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货物通关效率，但与贸易便利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建立“一站式”电子通关系统的经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区域通关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通关无纸化，大幅提升海关透明度。此外，应加强与沿线各国在海关管理方面的合作，建立相关政策法规的相互通报制度，在减少通关障碍的同时，逐步实现与沿线各国海关间的互联互通。

3.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区域贸易增长。

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利于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促进国际贸易规则的执行，有效地为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消除障碍。因此，一方面中国应积极推进并深化与沿线国家已有的自贸区升级，充分利用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经济合作与

1. 提升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可以极大促进我国出口贸易流量的提升，并显著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2. 在贸易便利化各项指标中，物流基础设施及效率与海

3. 贸易便利化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从实证结果来看，贸易便利化更有利于资本品、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并且有利于产品出口种类的增加，从而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

(二) 政策建议

1. 继续深入推

发展组织、中国-中东欧“17+1”合作机制等深化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另一方面要积极与条件成熟的沿线国家建立双边或多边自贸区，以加强我国与沿线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

学术前沿

一、智库报告

1、“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中医药中心建设现状与启示

【来源】《国际中医中药杂志》(12期)

【作者】张子隽；宋坪；蒋兆媛；陆烨鑫；杨龙会；周洪伟

【关键词】国际合作；一带一路；中医药；海外中心；现状与启示

【出版日期】2020-12-30

【观点摘要】《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实施以来，海外中医药中心逐步建立，成为推广中医药文化、引领并带动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阵地。分析海外中医药中心数量、地域分布及执行单位，并对中国中医科学院执行的4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建设的模式及成效进行归纳，提出海外中医药中心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建议积极推动海外中医药中心纳入政府间合作，加大本土化人才培养，创新运营模式等，以促进海外中医药中心良性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2、“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发展

【来源】《南开日本研究》(2020年)

【作者】赵宏伟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治理模式；后疫情时代；中日关系

【出版日期】2020-12-31

【观点摘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发展。它一方面加速了技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重塑；另一方面也为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脱贫之路，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虽然以美国为首的旧发达国家仍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但本文认为，无论旧发达国家是否愿意，它们都只能参与其中，分享共同发展的果实。当然，在主观认知上，要使旧发达国家充分接受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心的新的全球治理模式还需要一个过程。正如日本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部分精英阶层虽然对其已有所理解，但社会主流的认知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中国需充分利用后疫情时代的外交优势，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使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在东亚地区率先得到验证。

3、“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双环流”评价指标体系

【来源】《“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双环流”评价指标体系》(2020年第二期)

【作者】杨正东；郑承军

【关键词】文化贸易；评价指标；“一带一路”；双环流

【出版日期】2020-12-31

【观点摘要】在“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征下，我国对外文化贸易评价体系需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使我国文化贸易评价指标体系服

从于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本文引入了以中国为枢纽的国际贸易共轭双环流模式。在确立了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目标后,分别构建了“一带一路”上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文化贸易“上、下环流”评价指标体系。最后给出结论和建议。

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企业知识转移的演化博弈

——基于知识中介的视角

【来源】《财经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郭毅;徐晓敏;王智敏;赵云辉

【关键词】“一带一路”;知识中介;知识转移;博弈

【出版日期】2021-01-05

【观点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方企业和沿线国家企业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由于转移双方政治、文化和法律环境等差异,知识转移很难顺利进行。因此,知识中介作为能理解转移双方的共有知识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构建中方企业、知识中介以及沿线国家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探求知识转移各方的知识转移行为和相应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博弈过程。研究表明,系统的演化稳定状态是知识转移直接效应、知识转移成本、“一带一路”政策激励与惩罚机制、核心技术泄露风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机制供给与“一带一路”发展合作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沈铭辉;沈陈

【关键词】“一带一路”;发展合作;机制供给;协调范式;比较优势;互联互通

【出版日期】2021-01-05

【观点摘要】在综合比较不同发展合作机制供给范式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全球化发展和深度一体化的背景下,“协调范式”有利于加强国内与国际机制之间的协调,实现合作参与国之间的优势互补。尽管比较优势应以市场为基础,但比较优势的递进需要政府的引导和规制,由此催生了国内机制的整合与国际机制的协调。“一带一路”发展合作致力于发挥和塑造比较优势,本质上是以优势互补为特征的“协调范式”发展合作。“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已形成融合、嵌入、嵌套、对接等机制供给路径,呈现丰富多元的内容设计,其对沿线国家和全球发展合作的效用也逐渐开始显现。当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发展合作仍存在某些机制障碍,为此应秉持开放型、包容性、差异化三大原则,在不断完善全球和地区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提升自身机制化水平,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6、“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研究

【来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作者】方鸣;谢敏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全球价值链地位;双重差分法

【出版日期】2021-01-06

【观点摘要】本文采用政策评估的有效方法——双重差分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进行评析。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地理区位上,“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升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中国邻国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上更为有效;从沿

线国家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对发达国家则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国际投资意向来看,实现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及制度合作将有助于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实证拓展研究使文末的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

7、统一战线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研究

【来源】《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孙晓琳;白莹;白雪

【关键词】统一战线;“一带一路”;建设路径

【出版日期】2021-01-10

【观点摘要】:在中美贸易战争背景和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于我国对外经济显得尤为重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合作共赢有促进作用。本文从统一战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广泛性与包容性相结合及长期性的特点和统一战线服务“一带一路”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的三大路径出发,提出了引导非公企业发展、发挥海外同胞优势、促进人文交流、做好统一战线智库建设等统一战线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举措。

8、“一带一路”下边境陆路口岸对外开放的优势、阻滞因素与对策

【来源】《对外经贸实务》(2021年第1期)

【作者】李雨佳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边境陆路口岸;对外开放;双边经济利益

【出版日期】2021-01-10

【观点摘要】边境陆路口岸的建设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工作的关键一步,也是打开与周边国家贸易,实现双边经济互联互通的重要手段。尽管我国对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十分重视,但由于目前边境陆路口岸在对外开放方面仍处于“个别改观、整体滞缓”的局面,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进展。从对外开放的形势、地理环境及政治因素、贸易竞争和体制创新这四个方面,深入研究阻碍边境陆路口岸对外开放进程的主要原因,明确当前形势下边境口岸面临的发展困难,并提出了深化邻国友谊、平衡双边经济利益、加强友好合作力度和优化双边贸易产业结构等见解,为边境陆路口岸对外开放创造新的优势。

9、制度距离与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的实证研究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王如玉;肖海峰

【关键词】“一带一路”;农产品贸易;出口效率;制度距离;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出版日期】2021-01-13

【观点摘要】为探讨制度距离等因素对中国农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市场出口效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2004—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水平和变化趋势,并把制度距离引入贸易非效率项,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农产品的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不同国家间具有较大的差异,并均呈现负的时变效应;制度距离对贸易效率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除此之外,关税和汇率对出口效率的提升也有阻碍作用,贸易双方签订自贸协定、贸易对象国为WTO成员国或APEC成员国对贸易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最后

就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的出口效率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等建议。

10、中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比较分析

——基于出口技术附加值视角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1 年第 2 期)

【作者】王如玉; 肖海峰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 出口技术结构; “一带一路”; 中澳比较; 竞争力

【出版日期】2021-01-14

【观点摘要】为探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问题, 基于出口技术结构和竞争态势角度, 对比评价了中国和澳大利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结果表明: 中国虽仍未改变在高技术附加值农产品上的劣势, 但在中等技术附加值及中等偏下技术附加值农产品上的竞争力有了明显提升; 相比于澳大利亚,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出口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曲线相距较远; 澳大利亚面临来自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压力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而中国面临来自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压力指数保持下降趋势; 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市场份额及竞争力而言, 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及市场份额显著提升, 而澳大利亚市场份额小幅增长、出口竞争力小幅下降。

1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来源】《区域金融研究》(2021 年第 1 期)

【作者】蒋平

【关键词】直接投资; 出口效应; “一带一路”; 贸易引力模型; 系统 GMM 估计

【出版日期】2021-01-15

【观点摘要】本文基于投资动机, 使用 2003~2019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面板数据, 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其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总体存在显著的出口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 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作用, 效率寻求型投资存在显著的出口替代作用, 并未发现明显的创新资产寻求型投资动机。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一带一路”经贸领域的政策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

12、强势美元会影响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吗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35 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来源】《当代财经》(2021 年第 1 期)

【作者】周阳

【关键词】强势美元; 货币锚地位; “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

【出版日期】2021-01-15

【观点摘要】在强势美元背景下,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 35 个国家的数据, 通过一个扩展的实证模型研究了强势美元对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 美元走强时有 11 个国家会选择锚定人民币来稳定本币汇率, 美元走弱时人民币的影响力较小; 人民币、美元及欧元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圈主要的货币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在强势美元周期下, 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有显著提升, 而美元的货币锚地位趋于下降。贸易关系及贸易竞争的存在是人民

币的货币锚地位提升的原因,此外,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区域仍限于东盟、东亚及南亚国家,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偏弱。因此,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持续深化贸易合作及推动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并进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野下的“一带一路”研究

【来源】《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姜安印; 刘博

【关键词】世界百年大变局; 全球化; “一带一路”

【出版日期】2021-01-15

【观点摘要】厘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一带一路”的关系,无论是对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还是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都具有现实意义。由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一带一路”都处于一个建构性认知的过程中,把握二者的关系首先需要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深刻认知。一个科学认知框架需要科学阐释三个问题,即何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后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在已有认知的基础上,着重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问题的本质,提出大变局是世界呈现的一种客观变化状态,其本质是一个集体认知准备和行动准备的过程。“一带一路”建设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大变局存紧密关系。持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必然将增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积极因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构一个利好的预期。

1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研究

【来源】《价格月刊》(2021年第1期)

【作者】李翠萍

【关键词】中国; 欧亚经济联盟; 贸易效率; 潜力; SFGM 模型

【出版日期】2021-01-15

【观点摘要】以中国对 EEU 成员国出口贸易为视角,运用 SFGM 模型,选取 2009—2018 年的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数据对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双边政府廉洁、贸易自由度、物流绩效、OFDI、共同边界等对中国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货膨胀也对出口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不显著。双边的地理距离、是否内陆国、关税税率、汇率等对中国出口欧亚经济联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汇率也具有抑制作用,但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即加强双边合作,提升清关效率,完善基础设施质量,便利贸易和运输效率,提高物流服务质量;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商品运输的效率,清除双方隐性贸易壁垒;加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加大信贷资金配置规模;积极推动中国与 EEU 成员国建立自贸区;实现双边资本、信息等资源的共享,从而提高贸易效率,减少贸易阻力。最终着眼于命运共同体及全球价值链视域,推动双边贸易发展。

15、先行贸易能否调节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空间计量分析

【来源】《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田毕飞; 邓彩霞

【关键词】制度距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先行贸易; “一带一路”; 空间计量

【观点摘要】运用 2005~2017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40 个投资东道国的投资存量数

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以及先行贸易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考虑空间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制度接近”和“经济制度逃逸”特征,即中国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与本国政治制度距离小而经济制度距离大的国家;先行贸易可有效促进中国开展海外投资,并降低投资过程中的政治制度障碍;投资所表现的市场寻求动机和风险规避特征较为明显,但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科技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并未对投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应建立区域协同机制,完善信息服务平台,积极开展海外贸易

16、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的出口创造效应

【来源】《国际经贸探索》(2021年第2期)

【作者】聂世坤;叶泽樱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创造效应;一带一路;国家异质性;新新贸易理论

【观点摘要】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 OFDI 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 2003~2018 年我国对 44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 OFDI 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 OFDI 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 2010 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 OFDI 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OFDI 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

17、交通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来源】《国际经贸探索》(2021年第2期)

【作者】冯帆;林发勤

【关键词】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企业出口;国际贸易;双重差分法

【出版日期】2021-02-25

【观点摘要】文章基于世界银行 2004~2017 年 45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1)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影响显著,基础设施越完善,企业从事出口经营可能性越大,出口比例也会越大。(2)交通基础设施合作可通过降低企业出口障碍、减少企业出口所需时间成本来改善当地出口,提高企业的出口可能性及出口比例。(3)相对于陆路运输,港口建设改善了沿线国家的交通类基础设施,并推动了当地企业的出口。此外,对于外资企业或外国投资占比较大的企业而言,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企业出口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18、中国-拉美共建“一带一路”的现状、问题与启示——基于智库研究视角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作者】王飞;胡薇

【关键词】智库;“一带一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拉合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出版日期】2021-03-05

【观点摘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当前,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双方凝聚合作共识、描绘合作蓝图。鉴于拉美智库在国家外交战略中的特殊作用和影响力,笔者力图以拉美智库为分析主体,动态分析拉美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互动,重点分析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一带一路”已成为拉美智库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但部分国家对该倡议仍存疑虑。拉美智库的“一带一路”研究还存在研究人员集中、研究领域狭窄的问题。为推动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发展,双方均需努力。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赋予了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新内容,成为积极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

二、政治法律

1、FTA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工标准的影响与我国应对策略

——以越南2021年《劳动法》为视角

【来源】《国际经济法学刊》(2020-12-31)

【作者】班小辉; 茆雅洁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自由贸易协定; 劳工标准; 越南; 劳动法

【摘要】为加快融入全球供应链,越南近些年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但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与劳工标准挂钩比较明显,对越南的国内劳工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兑现在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承诺,越南加快了劳动立法的变革进程。CPTPP和EVFTA的签署推动了越南于2019年再次修订《劳动法》,在劳动合同、延长工作时间、女性劳动者保护、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等方面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我国政府和企业应从加强风险预警、健全企业用工合规体系、事后积极应对与加强监管三方面,积极回应越南快速提高劳工标准带来的投资风险,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在越南的顺利推进。

2、“一带一路”视域下完善检察供给研究

——基于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考察

【来源】《中国检察官》(2021-01-05)

【作者】刘清洋; 王胜华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新疆检察机关; 检察供给; 中亚

【摘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司法助力保障。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桥头堡与核心地带,提供优质检察产品和检察服务,新疆检察机关责无旁贷。面对当前理论供给滞后、法律研究缺失、人才储备和司法实践不足等突出问题,新疆检察机关需要建立同中亚国家检察交流和人才培养机制,健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建立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检察理论和实务研究机制,完善跨国检察合作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充足的检察供给。

3、“一带一路”背景下金融法律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探究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21-01-05)

【作者】赖柳宏

【关键词】“一带一路”; 金融监管; 国际合作; 法律机制

【摘要】“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使得沿线国家更加团结,资源共享的时代里经济合作愈加深入,伴随而来的便是金融风险 and 纠纷的显现越来越突出。为了进一步加强沿线国家的合作,

将“一带一路”政策贯穿始终,应该从法律方面完善合作机制,以期经济秩序得到稳定的发展。文章将从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性出发,叙述“一带一路”金融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困境,在最后提出法律相关的完善建议,相信只有立足于实践和法律才能实现建造经济共享的盛世。

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企业“走出去”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对策研究

【来源】《中国市场》(2021-01-08)

【作者】李鹏程

【关键词】“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制度;区域政策法律风险

【摘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体系尤其是知识产权制度与我国差异显著,在该种背景下,“一带一路”重要倡议为区域间知识产权保护装上规则之轮,法治之翼,是融通古今、连接中外,积极探索世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中国态度”,也是化解区域间政策法律风险、建构沿途诸国广泛认可新模式的“中国担当”。

5、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法律问题研究

【来源】《安徽农业科学》(2021-01-08)

【作者】牛文杰

【关键词】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知识产权;投资;标准

【摘要】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农业合作法律框架,农业合作的开展有着国际法律基础、区域法律基础和双边法律基础。农业知识产权、农业投资和农业标准是开展农业合作的重点,在农业合作过程中存在国际法律原则不协调、区域法律框架不适用和双边法律机制不完善的法律困境。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业合作还需进一步明确农业合作的国际法律原则、构建农业合作的区域法律框架以及完善农业合作的双边法律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优化农业投资规则及增强农业标准的效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经济贸易的发展。

6、“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重构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1-01-13)

【作者】刘亚军

【关键词】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投资保险

【摘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法律体系、保险人经营模式、海外投资保险资本结构、合格投资者定义和海外投资保险追偿机制在与国际立法的衔接上均有着体系上的不足。我们应重新审视这些制度,重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立法上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重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在经营范式上确立投资保险与融资支持并重范式,重构海外投资保险人经营模式;在资本运营上引入多元资本,重构海外投资保险的资本模式;在合格投资者定义上,扩大被保险人范围,完善双边协定中的代位权条款,重构海外投资保险追偿机制。从五个方面全方位、立体化重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7、“一带一路”倡议下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区域化改革前瞻

【来源】《求是学刊》(2021-01-15)

【作者】王海英;衣淑玲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碎片化；区域化

【摘要】就国际投资协定（IIA）中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而言，IIA 的碎片化无疑是成因之一，而其多边化或区域化则有助于提升 IIA 条文解释的一致性和仲裁裁决的可预见性。欧盟正在推动 IIA 投资仲裁机制的多边化，并使其成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议题。我国和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该议题工作组的成员。以此为契机，我国应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下 IIA 投资仲裁机制的区域化改革，寻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模式。

8、“一带一路”背景下铁路提单的法律支撑

【来源】《河北法学》(2021-02-07)

【作者】邢海宝

【关键词】凭单交货；物权凭证；海运提单；铁路提单；铁路运单

【摘要】“一带一路”中欧铁路贸易运输需要具有物权凭证特性的运输单证。在政策支持下，一些地方参照海运提单创设了铁路提单，并将铁路提单与改造后的铁路运单组合使用。铁路提单尚未得到商事习惯的认可或者法律法规的承认，将铁路提单和铁路运单组合使用也不可行。鉴于铁路提单商事习惯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目前切实可行的路径是紧扣物权凭证的核心要素，立足提单转让流通、凭单交货提货、运输控制权等方面制定较为系统而具体的规则，从法律上给予确认和支撑，使铁路提单取得物权凭证的地位。在创制铁路提单法律规则时，除了要参照、整合我国《民法典》《海商法》关于海运提单的规定，还要借鉴吸收国际上的有益经验。

三、经贸金融

1、“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意大利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研究

【来源】《对外经贸》(2020-12-30)

【作者】戴庆玲；侯静怡

【关键词】中意贸易；“一带一路”；产业内贸易；机电产品

【摘要】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中意 1992—2018 年面板数据，分析了两国机电产品的贸易规模和结构，测算了双边机电产品贸易的 GL 指数、MIIT 指数和分类指数，并实证分析了中意两国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从意大利主要进口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而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机电产品。中意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处于中等水平，但产品细分类目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差异明显。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意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受人均收入差异、技术进步、经济规模 and 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最后从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和提升意对华投资利用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2、债务结构、信贷摩擦与跨境融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

【来源】《数量经济研究》(2020-12-31)

【作者】张海亮；裘博为；刘丹

【关键词】债务结构；信贷摩擦；跨境融资；“一带一路”

【摘要】本文在经典的企业动态模型基础上，将债务品种可选项延伸至国际视角，并纳入信贷摩擦系数，构建新的理论模型，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债务融资品种和空间的最优

选择问题。同时,利用 2015~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跨境融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信贷摩擦对债务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为了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内部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应选择市场债务,内部资金实力不足的企业应选择混合债务;内部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比内部资金实力不足的企业更适合进行境外融资。进一步,信贷摩擦的存在会对企业债务的空间结构产生影响。当信贷摩擦水平较低时,企业不应选择境外融资,随着信贷摩擦水平的提高,企业可以考虑逐渐进入海外融资市场。本文为境内融资收紧下,“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债务融资提供了理论指导,为相关部门优化区域内融资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3、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广西与东盟国家林业合作探究

【来源】《广西林业科学》(2020-12-31)

【作者】梁萍;龙娟;孙冬婧;朱慧;张幸;曾怡嘉;李开祥

【关键词】“一带一路”;东盟国家;林业合作;建议

【摘要】东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合作伙伴,广西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双方均拥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在林业发展方面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本文分析了广西与东盟开展林业合作的必要性,总结了广西与东盟林业交流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下一步林业合作提出了建议。

4、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贸易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

【来源】《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12-31)

【作者】李新英;周姿汝

【关键词】贸易投资便利化;贸易效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一带一路”

【摘要】贸易投资便利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释放贸易潜力,为沿线各国带来更大的经贸福利。本文构建了贸易投资便利化指标评价体系,揭示 2009-2018 年“一带一路”沿线 32 个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时空特征;并将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相应指标引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贸易非效率项中,从双边贸易的角度,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8 年沿线国家便利化水平有不同程度提升,空间上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特征;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逐年提升;加入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海关环境改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对双边贸易效率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

5、我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或地区高铁列车产品认证策略研究

【来源】《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2-31)

【作者】康洪军;司志强;田婉琪;赵鹏;张璞

【关键词】一带一路;欧盟;俄罗斯;高速列车;产品认证

【摘要】动车组作为高速铁路的核心装备,随着“一带一路”铁路建设项目的进展正在积极“走出去”。我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或地区高铁产品认证过程中面临准入制度和技术标准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检验检测认证互认格局、认证过程复杂的问题,按照产品认证特点和难度将国家或地区划分为四类,代表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欧盟、印尼、非洲、俄罗斯。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我国出口“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或地区高铁列车产品认证的应对策略,可以分别从参与国际铁路标准制订和修订、建立适用于高速动车组国际化技术规范体系、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市场推广战略、争取尽快获得 TSIs 采信实现自主检测四方面各有侧重的开展认证工作。

6、“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北地区粮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来源】《地理科学》(2020-12-31)

【作者】徐文明; 朱显平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粮食产业; 转型升级; 东北地区

【摘要】采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北地区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与驱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北地区粮食产业发展问题研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粮食产业转型升级的优化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新结构经济学通过要素禀赋的内生驱动,产业梯度转移通过竞合效应与传导机制,顺向投资通过效率寻求型顺向投资、市场寻求型顺向投资和资源寻求型顺向投资,进出口贸易通过贸易自由化竞争效应、贸易结构先导效应、市场规模扩张效应共同驱动粮食产业优化升级;②东北地区粮食产业发展面临粮食增长不稳定、增速不可持续性、种植结构需要继续优化以及种植质量和农产品效益亟需提升的问题;③未来东北地区需要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粮食产业链价值增值为着力点、以顺向投资为重要途径,以进出口贸易为突破口推动粮食产业转型升级。

7、“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省对外贸易潜力研究

【来源】《中国管理信息化》(2021-01-01)

【作者】申雨

【关键词】一带一路; 引力模型; 贸易潜力

【摘要】在丝绸之路的牵引下,陕西省迎合这一契机,其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文章利用陕西省2010-2018年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板的引力模型,通过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对陕西省对外贸易潜力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提高、人口增长、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带一路政策提出都会对陕西省出口贸易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但距离依旧会阻碍出口贸易,陕西省与日本、俄罗斯等仍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应加大引导。

8、“一带一路”倡议下广东省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协同发展研究

【来源】《中国商论》(2021-01-04)

【作者】曹银华; 巫文杰; 李澳

【关键词】一带一路; 国际贸易; 国际物流; 协同发展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广东省借助其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广东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其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的发展迎来了机遇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挑战。查找最新相关数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广东省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协同发展的现状,发现两者可以实现协同发展,与此同时存在协同难度大、物流企业发展缓慢、两者沟通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从“一带一路”视角出发,提出了创造协同发展新环境、增强物流企业实力、促进两者的全面对接等建议。

9、后疫情时代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路径研究——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来源】《中国商论》(2021-01-04)

【作者】罗子恒; 张潇; 周小漫

【关键词】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体系

【摘要】2019年末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催生新的国际时代格局。本文针对后疫情时代下人民币国家化的机遇和挑战深入分析,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美元霸权、世界货币体制限制、疫情后全球市场萎靡和国内金融体制脆弱等问题。“一带一路”视角下提出人民币国际化要从商业银行网络化布局、完善国内金融体系、产业结构优化等措施保障实施。

10、英语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来源】《中国商论》(2021-01-04)

【作者】秦莹

【关键词】一带一路；英语；国际经济贸易；引力模型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地位被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这无疑会对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为了探索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影响,本文首先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新贸易数据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通用语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引入改良的经济学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英语的合理运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提高英语的运用能力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11、“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再考察 ——基于修正和扩展的CMS模型

【来源】《江苏农业科学》(2021-01-05)

【作者】丁瑶；曹历娟

【关键词】“一带一路”；越南；农产品出口；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摘要】越南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近年来逐渐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重要的目的市场。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速明显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却一枝独秀,保持连续高增长。然而,同期中国农产品占越南市场的份额却呈下降趋势。本研究分别采用修正和拓展的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测度分析了中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及我国在越南农产品进口市场份额下降的原因。研究表明,越南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是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竞争力和出口产品结构则给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并成为制约我国在越南农产品进口市场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我国必须高度重视竞争策略的改变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以推动对越南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的出口。

1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1-05)

【作者】孙致陆；李先德；李思经

【关键词】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

【摘要】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13、贸易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经验分析

【来源】《商业经济研究》(2021-01-07)

【作者】许珂;林子赛

【关键词】贸易产品密度;出口市场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贸易竞争格局;资源禀赋

【摘要】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2009—2018年数据样本,实证分析了贸易产品密度对出口市场拓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产品密度总体不断提高,同时产品密度大小分别因产品类别而异,因区域而异;产品密度对本国出口市场拓展存在显著推动作用,同时这种影响效应也是分别因产品种类而异,因区域而异。产品密度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作用最为明显,但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尚未显现。此外,产品密度对东盟、西亚中东及北非、中东欧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明显,但是对东亚及中亚、南亚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显著发挥。

14、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双边金融合作——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来源】《金融与经济》(2021-01-07)

【作者】申韬;蒙飘飘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金融合作;调节效应

【摘要】基于现阶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合作进展构建金融合作指标体系,利用5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3—2018年的数据度量双边金融合作程度,在此基础上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双边金融合作的影响,同时考虑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促成双边金融合作的重要因素。此外,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直接投资与双边金融合作的影响存在调节效应,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畅通双边金融合作通道。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需积极跟进直接投资项目,形成“直接投资—促成金融合作—更高效直接投资—更高质金融合作”的良性循环。

15、“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投资:研究述评与展望

【来源】《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01-08)

【作者】祝继高;王谊;汤谷良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文献回顾;研究展望

【摘要】本文对2013—2020年中英文权威期刊中发表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投资为主题的文献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基于对现有“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投资文献的编码,本文总结出OLI范式、制度、国家距离、关系和第三国五个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并从母国、东道国和投资主体三方面梳理了对外投资的经济效果。针对现有文献更多基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投资实践的不足,本文

提出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情境特征,以“五通”为基本框架分析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并从不同层面拓展对于对外投资经济效益的探讨。本文全面总结了现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相关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构建和完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奠定了文献基础。并且,本文结合“一带一路”具体情境构建了未来研究框架,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1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测度及其对中国 OFDI 的影响

【来源】《统计与决策》(2021-01-12)

【作者】任燕;邱玉雪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风险;对外直接投资(OFDI);引力模型

【摘要】文章通过构建国家投资风险测度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水平进行测度,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探讨国家投资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剧了各国投资风险的不稳定性;国家投资风险水平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双边投资协定、资源禀赋、税负水平等也能显著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17、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视角

【来源】《区域金融研究》(2021-01-15)

【作者】李季刚;马勇

【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效率;Dea-Malmquist;Tobit;异质性

【摘要】本文基于 Dea-Malmquist 模型测算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上市公司 2010~2019 年的投资效率及其分解,并运用 Tobit 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政策等因素对沿线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政策对沿线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一带一路”政策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强于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18、“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研究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21-02-28)

【作者】俞海杰

【关键词】“一带一路”;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中国中东外交

【摘要】

19、“一带一路”对云南与东盟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分析

【来源】《经济问题探索》(2021-03-01)

【作者】王桀;宋俊楷;孟帅康

【关键词】“一带一路”;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网络;东盟;云南

【摘要】云南是中国通往东盟的重要通道,研究云南面向东盟国家的旅游经济联系和空间网络演化,对建设“一带一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云南省及

东盟十国的国际入境游客为研究对象,运用旅游经济联系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云南与东盟国家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规模以及空间网络结构演变趋势。研究主要发现: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面向东盟十国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和规模均显著提升;曾经的一个旅游经济网络中心(泰国)向外围扩散,形成多个网络中心(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云南);越南迅速崛起,网络空间的辐射作用及扩展趋势超过云南。

20、“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数字贸易水平的测度及其对中国外贸成本的影响

【来源】《工业技术经济》(2021-03-01)

【作者】李轩;李珮萍

【关键词】数字贸易理论;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数;双边贸易成本;“一带一路”贸易;
中低收入国家;层次分析法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数字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相较于传统贸易模式,数字贸易将数字技术、互联网经济和国际贸易深度融合,促使全球贸易经济高效发展。本文梳理了数字贸易对贸易成本的作用机理,建立了数字贸易竞争力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贸易伙伴国家的数字贸易水平进行了测度,测算了中国与贸易国的贸易成本,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2009~2019年27个“一带一路”国家为样本的面板数据,对数字贸易与贸易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数字贸易水平的提升对两国双边贸易成本有显著降低效应的结论,同时稳健性检验还说明数字贸易对中国与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成本的降低程度更加显著。